

龐萬倫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講座系列四

# 心靈何價？

◇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  
教育與心靈：  
基督宗教與中華文化  
傳統的回應

陸鴻基著

崇基學院宗教研究叢書

## 第一章

# 「全球一體化」： 經濟、政治和社會轉變 對中華傳統和基督宗教價值的挑戰

## 1. 解題

第一章的題目是「『全球一體化』：經濟、政治和社會轉變對中華傳統和基督宗教價值的挑戰」。首先粗略地解題：「全球一體化」泛指全世界各地方之間經濟、文化、政治、宗教和旅遊等各種關係越來越密切，漸漸達到聯成一體、事事共通的情況。「全球一體化」（globalization）是新名詞，但世界各地關連愈趨密切，卻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主要的發展在最近的一二百年。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已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觀念。可見在四十年前已經有人注意到「全球一體化」——全球各地關係越來越密切的現象。然而，當時的講法是從通訊科技及運輸科技的角度出發，指出人與人跨地域聯繫越趨密切，並非專指經濟活動方面。近二三十年，更出現了大規模的、頻繁的、跨國界的商品、勞動力和資金流動的情況。今天，我們見到的已並非只是“global village”，而更重要的是“global capital”——全球流動的資金。全球資金流動尤其使「全球一體化」的概念產生很多轉變，突出了若干類型的經濟活動和營運方式，同時也忽略了（或貶低

了）其他類型的跨地域聯繫。突顯的就是「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capitalist globalization，或稱global capitalism）。

交通運輸和通訊的發達，打破了地域的阻隔，有助促進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理念的人之間的溝通和瞭解，衝破畛域、國籍和膚色的圍限，因而理應加強人類一家親，消滅無謂的分歧，是實現「地球村」世界大同的大道。但是運輸和通訊科技的進步，也同樣可以助長優勢社羣擴展他們的既得利益，擴大他們與弱勢社羣之間的差距，擴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鴻溝，實行所謂「環球搶掠」（“global pillage”）的霸業。關鍵在於利用新科技的人憑着什麼理念、推動怎麼樣的全球一體化。主導思想究竟是私利和物慾，還是社會上、世界上人人的德智體羣美的成長呢？

從近月來「金融海嘯」的經驗來看，「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許多轉變往往使人們難以適應，從而產生很多的問題，需要我們好好的反思。我希望借着這個講座的機會，和大家一同探討這些問題。

講題的另一重點是「中華傳統價值」。什麼是「中華傳統價值」呢？經歷了二、三千年的歷史、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華人，其傳統極其豐富多樣，文獻典籍也浩如煙海，實在難以一言蔽之、難以一概而論。二十多年前，哈佛大學楊聯陞教授應邀來到香港中文大學講學，他以「包」、「保」、「報」三字總結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sup>1</sup>楊教授的學養和功力都極為深厚，我無從望其項背，不敢從此入手。在此姑且以儒、釋、道的若干典籍作為代表，粗略地談一下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當然也要借助古今學人對這些典籍的闡釋。儒、釋、道的思想、信念和價值觀，在二十世紀都受到很猛烈的抨擊和否定。二十世紀華人社會思想的主流，大概可以說是傳統的法家結合外來的「物競天擇」思維，加上各種西方經濟政治主義。不過，儒、釋、道學說和價值觀念畢竟是二千年的承傳，深印人心；近年也在知識階層之間重獲正視和肯定。

<sup>1</sup> 楊聯陞：《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

至於「基督宗教」，同樣經歷了二千年歷史、基督教各宗派信徒合共也有全球人口四分之一，其傳統和價值也是極豐富多樣，學術著作也極浩繁，同樣難以一言蔽之。在此也姑且以「福音」作為代表，並借助古哲今賢的解說、體認和闡發。

以儒、釋、道典籍及「福音」作為兩大傳統價值的代表，不是說這兩大傳統經歷了二千年沒有絲毫改變，一切仍如起初。講座的重點是要連繫兩大傳統與近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作出對比，從而探討兩大傳統在今人生活中的體現。囿於講座時間的限制，不能就兩大傳統作深入的分析考究，只是粗枝大葉地取其經籍賢傳作為引發討論的開端而已。

## 2. 全球一體化

「全球一體化」是近幾年才流行的新名詞，但它代表的現象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由來已漸的。以下簡述從公元十五世紀「新航路的開拓」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四五個世紀的發展加以說明，其中的重大里程碑包括歐洲航海家、商人和傳教士東來，全球航運、通訊和貿易網絡的建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全球經濟大蕭條，第二次大戰後世界新經濟秩序的成立和轉化，以至近三十年來全球財經市場的崛起及其思想價值，等等。

### 2.1 從「新航路開拓」到第二次大戰後

自從公元十三世紀成吉思汗及忽必烈汗的蒙古帝國軍隊打通了亞歐陸路交通以後，開始有人直接從東亞走向歐洲，或是從歐洲直接走到來東亞——在此以前，只有間接的貿易往還。宗教信仰也經由貿易路線傳播：佛教、基督宗教的首次來華（景教）、與及伊斯蘭教，都是漢唐時代從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也都是「全球化」的前奏。在蒙古帝國時期，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馬可孛羅（Marco Polo）以外，當時的羅馬教宗亦派遣了方濟各會修士（Franciscan Friars）東來中國傳道，是為基督宗教第二次入華。當時漢人信教的絕無僅有，但卻有若

干數量的蒙古人相信了基督宗教。元朝時代曾經有一段頗長的時間在大都（即今北京）駐有意大利籍的主教，而歷任北京主教都是方濟各會的成員。

相反方向，從亞洲走向歐洲的人，最有名的例子是大家從武俠小說認識、歷史上真有其人的長春真人丘處機（1148-1227）。元太祖邀請他西行會面；1222年他到達今天的阿富汗地域，多次向成吉思汗講道，勸說他戒殺戮。其後他回到中土，隨行弟子著有《長春真人西遊紀》，紀錄所見所聞。蒙古帝國橫跨歐亞大陸，促進了貫通東西的陸路交通，也刺激了後人探求新航路的熱忱。

環繞全球的交通，要數馬可孛羅和長春真人之後二百年的所謂「新航路開拓」。大家熟悉的鄭和七下西洋，就我們所知最遠到達了非洲的東岸，打通了印度洋的東西岸。其後又有達伽瑪（Vasco da Gama）等葡萄牙人從西歐尋路至亞洲一帶，最後在1517年，葡萄牙船隻繞過非洲，渡過印度洋到了珠江口，首次連接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後來前往澳門。另一方向，由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領導的西班牙船隊橫渡大西洋，1492年在美洲離島登岸。其後，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領導的西班牙船隊又從南美洲橫越太平洋抵達了菲律賓，再西行回到西班牙，是為歷史上的首次環球航行。

促成環球貿易，就是探險船隊開拓了這些新航道以後，西班牙與葡萄牙各自在世界各大洲佔據領土，建立殖民地。他們以這些殖民地作為基地，創始了連繫各大洲的環球貿易。西班牙人佔領馬尼拉，推動菲律賓羣島與中國福建通商。中國各地產品經福建出口至菲律賓，由西班牙船隊從菲律賓橫渡太平洋至墨西哥西岸、轉陸路運到墨西哥灣，再橫越大西洋到歐洲。龐大的馬尼拉船隊（Manila Galleon），每年往返太平洋兩岸，一直維持了八十年，是為歷史上首次打通環球貿易。葡萄牙和它的殖民地：澳門、帝汶、馬六甲、果亞、莫三鼻給和巴西等，則組成另一個環球貿易系統。

1582年，大家耳熟能詳的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 來華。他乘坐葡萄牙商船從歐洲到了澳門，潛進廣東肇慶，接着花了十八年學習中文，並熟讀儒家典籍。從他開始，往後的百多年，公教的傳教士陸續引進環球地理學以及基督宗教的信仰和學術來到中國。與此同時，這些長居中國的公教傳教士，也把他們的所見所聞傳回歐洲。第一位將中國學術思想西傳而滿有成就的是耶穌會士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他把利瑪竇的意大利文日記遺稿帶回歐洲、翻譯成拉丁文發表；儒家思想學說與中國歷史和地理知識於是首次傳到了歐洲。東亞和西歐的思想學術交流，乃自此開始。<sup>2</sup>

在這裏，必須一提崇基學院牌坊上的對聯。1970年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工作的時候，每天都會從大埔道走在崇基牌坊下面，到崇基教學樓上班。牌坊上的對聯成了我最喜愛的一副對聯，經常唸在口中；上聯是：「崇高唯博愛，本天地立心，無間東西，溝通學術」。我們談到全球化，且不要忘記「無間東西，溝通學術」是從1582年利瑪竇來華那一刻開始的，至今已四百多年。這是基督宗教和中華文化傳統的初會，世界文化匯流的一塊重要里程碑。龐萬倫講座的遠源正在於此。

其後到了十七、八世紀，英國與法國、及英國荷蘭之間，分別多次爆發全球性的大戰，爭奪生產胡椒等香料的島嶼和對亞洲貿易的立足地（包括澳門，澳門的古城堡和炮台，就是這些歐洲帝國爭霸戰的遺物）。終於，荷蘭霸佔了整個東印度羣島，成為日後的印尼，而英國則獨霸南亞次大陸，開始建立其亞洲帝國。歐西各帝國的貿易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宏遠。十八世紀後期，西歐開啟了以水力或蒸汽機推動大型機械的製造業，是為工業革命。英、法等國的工業革命，造成少數歐洲國家的經濟力量以至軍事力量都遠遠超越其他國家。它們對原材料的需求，以及大批工業製成品的銷售，都促使它們致力掌握國外廣大地域，操控市場——遂產生了十九世紀西方的帝

2 Louis J. Gallaghe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國主義。換句話說，由於工業革命，西方國家的工廠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供應；同時，工廠利用原材料生產的大量製成品，也需要龐大的市場銷售去支撐。產品出售賺來很多錢，是以富國強兵。這樣就造成了英、法等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興起。十六、七世紀西班牙、葡萄牙帝國初創的環球貿易，規模和商品種類尚且相當有限；工業革命以後，英、法、德、美等國支配的環球貿易規模越來越大，商品越來越繁多，通商網絡也越來越繁密。

基督宗教也在這時期再度傳入中國，其影響比較以前幾次都較大。1807年第一位基督新教傳教士、英國人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抵達澳門，也是全球一體化的一塊重要里程碑，距今剛好二百年。<sup>3</sup>

帝國主義帶來的各樣影響，包括鴉片戰爭及香港開埠等，對於我們當然不陌生。十九、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使到聯繫全世界各地的經濟活動愈趨緊密，越來越深入五大洲各角落。這個環球經濟體系的成長，也跟十九、二十世紀的交通運輸和通訊科技突飛猛進，是互為因果的，例如蒸汽船、火車及電報的使用。1869年蘇彝士運河啟用，歐洲及亞洲之間的航程大為縮短。稍後，以英國為起點鋪設的海底電纜，也伸延到了香港，再東渡太平洋到北美洲；遠程電導傳訊從而開啟了。十九世紀後期，全世界已建立了四通八達的航運網絡，運用現代的航海科技，運送貨物和乘客；二十世紀中後期更有日趨普及的航空運輸。資訊方面，十九世紀末只要有電纜連接的地方，新聞訊息可以即日傳播出去，到世界任何一端。我們所熟悉的現代世界乃從十九世紀末開始。運輸和通訊科技越發達，而人們遠程溝通的願望越強，世界各地的聯繫也就越緊密。香港開埠初期，港督跟英廷通訊只能靠海運，動輒需時數月。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的典禮，電視現場直播，我遠在地球背面的多倫多同步觀看。資訊的密切聯繫，與經濟全球化

3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是互為表裏的。<sup>4</sup>

鴉片戰爭九十年以後的1929年，美國紐約股市暴瀉，觸發了全球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紐約股市崩潰之所以能夠影響世界各地，乃因為當時全世界的主要市場已經連成一體；即使是對於身處世界另一角落的香港人也有相當直接的影響。例如，在紐約股市崩潰以前，珠江三角洲一帶生產蠶絲出口到歐美，是世界市場上的一個重要供應地，也是當時中國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當時，珠江三角洲很多少女在設有新型機械的繅絲工廠打工。然而，紐約股市崩潰造成全球經濟衰退以後，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市場，對生活上並非必須的絲織產品，需求大幅下跌。於是珠江三角洲的繅絲工廠紛紛倒閉。那些曾在工廠工作的女工，由於形成了新的自食其力的婦女自主意識，再也不願回家鄉出嫁當人家的媳婦，於是聯羣流徙到廣州、香港和澳門等等珠江三角洲大城市，任職家庭女傭。他們就是我童年時代香港街上仍然不時遇見的「嫲姐」。1950、60年代，成千上萬香港家庭依賴的這股勞動力，就是1929年紐約股市崩潰，帶給環環相扣的全球經濟的一種長遠效應——雖然當年全球經濟連繫的程度尚遠不如今日。<sup>5</sup>（這個例子，也可供我們比較一下1920年代和2000年代全球經濟聯繫的廣度和密度。1920年代珠江三角洲出口貨品只有蠶絲等幾類，所用的勞動力也限於三角洲的農村；2000年代貨品種類多不勝數、價值是天文數字，勞動力則來自華南各地、遠至四川省、人數以百萬計。據廣東省就業服務管理局在2009年初的預測，農曆新年後會有970萬外省「農民工」南下廣東，其中約260萬沒有明確的工作，而廣東第一季就業需求預測則僅有190萬人——《世界日報周刊》（2009.03.15）轉載《南方周末》的報導。全中國各地經歷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改變，「金融海嘯」的衝擊將要比八十年前的「大蕭條」時期深遠得多。）<sup>6</sup>

4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C. Topik, *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 2nd ed. (Armonk NY: M.E. Sharpe, 2006).

5 Marjorie Topley, "Marriage Resistance in Rural Kwangtung," i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ed.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67-88.

6 潘毅：《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

全球各地的經濟命運在二十世紀初既已連繫起來，很自然地經濟思想也連繫起來了。30年代以降，資本主義世界有過兩股重大的經濟思潮，就是力求克服大蕭條的「凱恩斯理論」（1930-70年代盛行），和反對凱恩斯的「新自由主義」（1970年代崛起）。這兩套理論都跟全球一體化的發展，有很深廣的關連；後者更是近三十年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理論基礎——以至目前「金融海嘯」的誘因。我們需要先弄清楚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才可以明瞭反對這些政策的「新自由主義」及我們今天的處境。

1930年代世界經濟蕭條，引發了新一套的經濟理論——英國牛津大學的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的經濟理論。他指出，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政府要擔當的角色，並非勸諭人民節衣縮食；因為如果經濟不景時人民更為節約，減低需求，只會導致經濟更為疲弱。但光是鼓勵人民消費，也只是無補於事，因為普羅大眾平民百姓實在無錢可花。相反，政府應該帶頭刺激需求。刺激需求的主要措施應該是公益事業，包括大幅度投入資源，進行基本建設，例如興建機場、道路或港口等等，或是多提供一些公共建設和社會服務機構，例如醫院和學校等等。因此，政府大灑金錢，並不是把公帑分發給市民、隨便「派糖」，而是花在對大眾有長遠利益、增進大眾實質幸福的事情上。政府撥出公帑進行基礎建設，為失業的民眾提供就業機會，一方面紓解人們生活的困厄和鬱結的情緒，另一方面讓重新就業的人得到薪金可以恢復有需要的消費，達到刺激經濟的效果；這樣，才是政府挽救經濟衰退的有效方法。政府在經濟衰退時若能大手筆地、慎選明智的投資，人民的健康、知識和生活質素也得以提昇，社會的公義、和諧和穩定也會得到改善。<sup>7</sup>

凱恩斯提出這套經濟理論以後，到了1930年代中後期，紛紛為西方國家所採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二、三十年，仍然以凱恩

7 William Barber,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Part 4; Mark 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16.

斯的經濟理論作為處理經濟問題的主導思想。（港英政府在1989年港人信心動搖、經濟低迷時推出興建新機場和增加教育投資，也有一點凱恩斯的意味；現今「金融海嘯」下，世界各國紛紛動用鉅額公帑進行基建，更是依循凱恩斯在大蕭條時期提出的建議。）1940年代在凱恩斯經濟思想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出「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政府有責任維持社會上的經濟需求。這既是社會公義的方針（跟當時基督教盛行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運動也契合）——窮人和富人的生活水平不應該有天淵之別：人人都應該得到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和尊嚴、享受到基本的教育、醫療及住屋福利。同時，這也是國家整體經濟的問題——因為如果社會上大部份人生活窮困，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偏低，經濟也就不會興旺；相反，如果社會上大部份人的生活得到保障，貧富不致太懸殊，比較多的人擁有較大消費能力，社會和經濟都會更為穩定。為了達致這個目的，政府應要透過累進稅收（高入息的人多納稅，低入息的人少納稅）等方式，把富人手中部份的金錢拿來開設普及的公營教育、醫療、住屋及民生基本保障等服務，進行有限度的「入息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income）——這種制度，也發揮了守望相助、互相扶持、同舟共濟的羣體精神；也符合不少教會人士信奉的「社會福音」理想。本着這樣的精神，人們在民主選舉中一同建立起「福利國家」的制度。<sup>8</sup> 財富被分配出去的有錢人不一定都很快意，但也接受了這是同舟共濟的公民義務，也是資本主義所需要的調節功能。（「入息再分配」不是社會主義，因為生產的資源和利益仍是由資本家私人控制的。累進所得稅、遺產稅、反壟斷法等，是防止財富過份集中、貧富過度懸殊、防止資本主義物極必反的調節機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二、三十年間，西方國家紛紛努力建立「福利國家」。但隨後，1980年代以來的三十年，很多西方政府都積極地企圖以各種手段削弱「福利國家」的理念和措施。這些政策波瀾，也衝擊到教育制度和理念。教育體系方面的衝擊，留待第二章交代；這

8 Fabian Society, *Just World* (London: Zed Books, 2005), Part I.

裏首先需要討論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的變化。

## 2.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布雷頓森林」財經制度（1946-7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還有另一系列的經濟措施在國際間實施起來，也是源於凱恩斯的，這就是「布雷頓森林制度」（Bretton Woods system）。「福利國家」是國內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布雷頓森林」則是國際的財經制度。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穩定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近尾聲，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建，成了急切議題。四十四個國家（都是二戰中即將勝利的盟國，包括中華民國）的代表，在美國東北部渡假村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展開會議，商討戰後的全球財經制度，邀請凱恩斯擔任經濟顧問，並簽署了一系列的經濟協議。這些協議由1946年開始生效，維持到1970年代初期。協議的內容是，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都會以黃金作為其貨幣的本位，但同時美元與黃金則訂下了固定比率——換言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皆採用美元作為貨幣本位，並且協定各國貨幣與美元的兌換率。各國亦同意本國貨幣不能偏離此固定匯率多於百分之一。<sup>9</sup> 制定這個協議的原因，是鑑於1929年紐約股市崩潰後，環球經濟蕭條時的經驗。當時，西歐各國貨幣爭相貶值：當某國的貨幣貶值，該國的外銷貨品短期內相對較便宜；相對來自貨幣價值較高的國家的貨品，競爭力自然較強。於是，別的國家為了增加本國產品外銷的競爭力，也會把本國貨幣貶值。各國爭相仿效，企圖令本國產品的出口降價搶售，終於導致各國幣值越來越低，各地買家都守望跌價，因而誰的貨品都賣不出去；惡性競爭之下，三十年代的環球經濟衰退情況更為惡化並且蔓延，令經濟更難以恢復。（2008年下半年，「金融海嘯」肆虐，各國政府似乎都意識到前車之鑑，努力不斷互相協商，避免爭相貶值一類的惡招重現。）

戰後「布雷頓森林」匯率制度的制訂，就是要確保各國再也不會

9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2), Chapter 1.

爭相貶值。各國都同意以後以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兌換的基準，並許諾本國貨幣與之有特定的匯率，不能偏離。同時，為了讓各國內部經濟穩定，作為全球經濟穩定的基礎，「布雷頓森林」制度對國與國之間大額金錢的流動，也有所限制，以免投機份子隨意調動資金，擾亂個別地區的金融秩序。

在「布雷頓森林」會議，各國也同意成立至今仍然重要的幾個機構，包括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等國際金融機關，用以執行和維繫「布雷頓森林」協議的實施。國際貨幣基金成立的宗旨主要是為各國面臨財政困難的中央銀行提供貸款；假設某國的貨幣承受很大壓力，難以維持與美元的匯率，它的中央銀行可以向國際貨幣基金借款支撐該國的金融體系，避免貶值或崩潰。至於世界銀行，它的作用是為較為貧窮的國家提供貸款，進行國內建設，提高經濟水平，促進現代化。<sup>10</sup> 1946年開始直至1960年代二十多年間，「布雷頓森林」協議的制度都運作得相當成功，直至美國侵略越南、泥足深陷為止。

1960年代美國在越南駐軍五十萬，投擲在幅員狹窄的越南的炸彈竟然比全世界各國在二戰期間互相投擲的炸彈總量還多。殘酷的殺戮行為，固然在越南造成極嚴重的破壞；同時對美國本身的經濟也是甚大的損耗。到了1970年代初，美國的經濟已難再維持，唯有不斷加印紙幣來支撐軍費。持續加印紙幣，自然會使到美元通脹，同時也引起了世界各國的疑慮。世界各國本來都認定美元是最為可靠的貨幣，以它作為國際匯兌的準繩，對穩定自己的貨幣，也不無好處。如今美元竟也貶值了，而西歐和日本等地的貨幣，甚至港元，卻是穩定得多，各國已再沒有意欲與美元維持固定的匯率；於是在1971至73年間，世界各國陸續脫離與美元之固定匯率。「布雷頓森林」匯率制度到了七十年代初瓦解了。（戰後初期，港元與英鎊之間有著法定匯率。1970年代初，英帝國金融體制的「英鎊區」（Sterling Area）解散了；從此以至1983年，港幣匯率以「一籃子」外幣計算。現行港幣與美元

<sup>10</sup> 同上註。

的掛鈎是1983年「中英談判」信心危機時訂立的。美元雖然喪失了各國貨幣準繩的地位，但仍是國際貿易上最重要的一種貨幣。）

各國貨幣與美元之固定匯率結束，也意味著「布雷頓森林」協議內其他相關的貨幣管制也相繼放棄了，例如對跨越國界的資金流動的限制，其後也逐漸放寬了。從1973年到現在，我們目睹國際間跨界流通的資金越來越多，這就是我們時常在新聞聽到的所謂「熱錢」——大筆資金在國際間流動作短期投資、急攻近利的「熱錢」。這種情況是「布雷頓森林」協議的締造者不願意見到的。

### 2.2.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若干區域的經濟增長

「布雷頓森林」財經制度，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維持了四分之一世紀的穩定，讓北美洲、西歐和亞洲部份地區有機會平穩地發展工業、增加財富、促進現代化。我們在香港也蒙其利。1930至40年代，世界各地都戰火連連，唯獨在美洲沒有戰場，因此北美地區的經濟蓬勃興旺，而西歐各國也因為得益於上述種種的經濟措施，戰後得以迅速復甦。日本雖然是戰敗國，但由於它在美國的軍事佔據之下，而美國也樂於協助日本復甦以抗衡蘇聯的力量，於是提供了不少日本貨進口美國的優惠，促進日本的工業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仍然是個農業為主的社會，國民收入只有約三分之一來自工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藉着美國的幫助，日本得以迅速工業化。）與此同時，東亞周邊地區包括香港、台灣、南韓及新加坡也有類似日本的發展。美國期望經濟增長及良好的發展前景，可以減低中國大陸周邊地區「共產化」的機會，因此也鼓勵四地的產品進口美國，以刺激它們的工業發展。這時期，西歐和北美各國的「福利國家」政策也促進了這些地區的中產階級擴大，人民的消費能力增長；這也為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產品提供市場。1950至1960年代無論是西歐的經濟復甦、或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工業經濟崛起，都是在「布雷頓森林」制度下、以美國為重心的國際貿易所帶動的。<sup>11</sup>

<sup>11</sup> 羅金義、李劍明合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第一部份。

經過1950至1960年代約二十年持續的經濟增長，及隨後二十年的鞏固和更上層樓，無論是西歐、日本抑或後來起步的「亞洲四小龍」，都成了相當富裕的社會。此時，這些社會的人們，還加上稍後19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漸見成績的中國大陸和印度等地的人，乃產生了經濟增長「無止境」的觀念，認為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只要搞好工業製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持續向上，社會整體的物質水平會越來越高；只要工業經濟繼續發展下去，收入必然越來越多，大眾的物質生活也自然會更為提昇。<sup>12</sup> 在這信念之下，大家迷信工業經濟的神力。只要我們的產品銷量不斷增進，我們的生活就會一年比一年富裕；因此，我們都需要日益擴大的市場，吸納我們的產品——最好是全世界毫無分隔的市場，任由我們的貨品通行無阻。<sup>13</sup> 這樣，大家都成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擁護者了。這套「自由貿易」思維，其實跟十九世紀帝國主義思想，有着不少共通之處。（鴉片戰爭就是英國要向中國硬推「自由貿易」。）但是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還有好些內在問題，值得我們反思。以下討論一下經濟增長觀和生產要素的靜和動的問題。

### 2.2.2 無止境的增長（unlimited growth）和可持續的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我們要是重新檢視工業經濟的內容，就會發現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不斷擴展，並非朝著大眾需要的實用產品方向邁進，而是生產和推銷一批又一批大眾本來並不需要的東西。舉例說，我們在街上走、或看電視，總會遇上各式各樣的廣告，宣傳各種產品。我們都知道廣告推銷的產品往往並不是我們生活上需要的，或更是在看到廣告宣傳以前，根本不知道該類產品存在、也不曾感覺有任何欠缺的。然而，我們經常接觸這些宣傳廣告後，會漸受其潛移默化，開始認為自己「需要」該產品，甚至覺得生活不可能缺少該產品。畢竟人的衣食住行的

<sup>12</sup> 同上註，第六部份。

<sup>13</sup> Ernst F.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As A 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London: Abacus, 1974), Chapter 1.

真正需要是有限的，但人的慾望卻可以是無窮的。因此，資本主義工業經濟若要無止境地增長，不可能光是看著人們有甚麼實質的需要得靠工業生產去滿足；相反，要利用各類消費廣告的刺激，不斷誘發人們的慾望，令人們覺得某些產品「非有不可」——換言之，是由「供應」帶動「需求」，而不是由實質「需要」帶動着「供應」。

尤有甚者，是1960年代以來，美國及世界各地的大廠商服膺的所謂「計劃報廢」（planned obsolescence）營銷模式。<sup>14</sup> 讓我舉出一點親身經歷，作為例子。十五年前，太太送給我一個電動鬚刨。這個鬚刨我天天都用，經過整整十年仍運作良好，直至有一天不小心把它跌在地上摔壞了。既然無法修理，太太於是給我再買一個新的。怎料新的電動鬚刨才用了兩年就不能開動了。這樣的經歷相信大家可能也不陌生，究竟是怎麼樣一回事呢？

原來，在生產第二個鬚刨的時代，廠家已改用了新的銷售策略。我們試想想，如果資本家生產的鬚刨可以運作二十年，而每個用家只有一張臉、只需要一個鬚刨，假設我將會活到七八十歲，我有生之年這樣產品廠家最多只能賣三件給我。人人如此，他的鬚刨總銷量實在有着先天性的限制。相反，如果鬚刨的生產在開始時已設計了只能運作兩年，每位消費者就會每兩年需要再購買一件新產品；產品銷量也就提升十倍。這就是「計劃報廢」的概念：意思是說，早在產品設計之時，廠商已經預算了產品將會定期損壞報廢。這本是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刺激消費」的一種手段，透過「工商管理碩士」（MBA）課程傳揚開來；近三十年來變本加厲；是把用家的錢財轉移至資本家手上的奇方妙法——且不要管它浪費多少天賦的資源。我少年時代，不時聽到電台廣告會以「貨品很耐用」或「產品不會損壞」作為宣傳口號；然而，大家已經有多久沒有聽過有關產品耐用性的宣傳廣告呢？到了今時今日，產品的耐用性不再用作招徠，代之而行的宣傳口號是產品「合乎潮流」和「帶動潮流」。這樣的改變，我們大多數人可能不曾意識到，但是下意識的觀念卻已隨之轉移了：這是資

<sup>14</sup> “Planned Obsolescence”, *Economist* (2009)（網上資料）。



本主義下的宣傳手段，潛移默化，改變大眾價值觀念的一個顯例。

更高超的「計劃報廢」營銷模式已漸成主流。在這方面，美國電腦業奇才比爾·蓋茨（Bill Gates, 1955- ）可謂箇中的佼佼者。他的微軟公司（Microsoft）不斷推出新的電腦軟件產品；新軟件產品的功能往往是你意想不到，更不要說那些功能是否真的自己所需了。然而，當你身邊所有人都有了這軟件，你就會感覺到自己也不能缺少它，否則便會追不上潮流，成為落伍人士。更有甚者，其他人寄電郵給你，但你發現有很多來郵你無法開啟，原因是別人已經運用最新的軟件去處理文牘，你在無可選擇之下，唯有再付錢給軟件商、購買新軟件，否則就會跟親友斷絕音問。再者，現在蓋茨手下的工程師在設計新軟件時，再也不會考慮如何節省電腦記憶體的空間，甚至可能令軟件霸佔更大的記憶體空間。因此，除了要不斷更新軟件以趕上潮流，當新軟件所需的操作空間越來越大，用家同時也就難免要不斷更新硬件以支援更多的軟件及更大的操作空間。這一種更為進取的「計劃報廢」，使人在毫無選擇下需要不斷消費新產品。資本家的市場和收益因此得以快速地、持續地擴張——難怪蓋茨白手興家，竟成了世界首富之一。但那些還不算殘舊的產品報廢了，代之以新的產品，也造成資源的浪費。無疑，微軟公司推出的軟件，往往都能幫助我們提高個別工序以至個別工程的效率或效果，這是它能夠不斷吸引人去購買的原因；也助長人們「科學昌明，年年進步」的信念。但「進步」到底是什麼呢？電腦科技無疑推陳出新，可是就我們每天、每年作息生活的整體而言，我們的辛勞卻似乎是加的多、減的少。唯一肯定的，是個人、機構和社會花在電腦軟硬件上的錢卻越來越多了。

資源浪費的另一個例子，一天我「無事出街小破財」，買了一件新衣服，回到家裏，打開衣櫃，已經再找不到一絲多餘的空隙去「安置」我的新襯衫了。事實上，我只有一個軀體，即使每天換衣服，也怎麼可能穿得完這麼多的襯衫呢？當然相對電動鬚刨或電腦那些較高檔次的資源浪費，這例子只屬於較低層次的資源浪費。社會上影響最大的資源浪費，大概是消費後無法循環再造、無法復原，又副作用極

大的石油資源。

工業無止境地增加生產，除了不斷消耗原材料，也不斷需要推動生產和運輸機器的能源。地球有限的物資，怎麼能支持無止境的增產呢？更多的工業生產，意味着更多的燃油正在燃燒。原材料及石油能源不斷消耗，既構成浪費，也造成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地球有限的海洋和大氣層，怎樣能吸收無止境地增加排放的污水廢氣呢？環境污染的經濟問題，早在三十年前已由原籍德國、逃避納粹統治移居英國的經濟學家舒馬赫（E.F. Schumacher, 1911 - 1977）提出。舒馬赫的經濟思想深受基督宗教的社會觀念影響。他在1973年出版的名著《小的才是美麗的》（*Small Is Beautiful*）指出，廠家在計算他的生產成本之時，是不會算及所消耗的大自然資源的；他只會着眼於生產所需的人力、廠房和原材料及能源等需要用金錢購買的資源，卻沒有意識到生產過程中消耗的、不用他付錢的清新空氣和清水等天然資源也是有代價的。這代價是由承受環境損耗的人們——就是社會上所有的人、世世代代——替資本公司支付了，除非政府向這位廠家徵收稅項，支付環境「復原」的代價。<sup>15</sup>

不過，天然資源的損耗往往是無法用金錢完全補償的。在生產過程中排放的廢氣和污水，對大自然造成很大的破壞。全球千千萬萬的工廠一起進行這種生產污染，使到整個地球被煙霧灰塵籠罩着，整片天空染成灰棕色，也被吸進人和動植物的身體裏去，積存毒素、侵蝕健康。美國毒物學及流行病學家荻芙拉·戴維思（Devra Davis, 1946- ）生動傳神地描繪她家鄉的污染，說：「煙濃若水流」，人也難免會減壽。<sup>16</sup>我們這個講座在二月下旬；這個月份的香港，早春時節，我小時候總可以看見藍天，但如今白晝望出窗外，只見灰朦朦的一片。終歸這些污染的問題，不單是一時一刻美感的問題，更關乎全人類和整個生態多世多代的健康。我們和環境中與我們氣息相通的

<sup>15</sup>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Chapter 2.

<sup>16</sup> Devra Davis, *When Smoke Ran Like Water: Tales of Environmental Deception and the Battle Against Pol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Part I.

動植物、老老幼幼都生了病，代價由誰去支付呢？社會上的肺癌患者增加，其他相關的公共健康及社會環境問題越來越多，這些代價又有誰考慮呢？（在加拿大，反對管制環境污染、反對徵收「污染稅」的資本家和政黨，同時也主張削減公共醫療開支，增加「用者自付」的商營醫藥服務。）

這一系列的問題，歸根究底，皆來自人們追求工業經濟的不斷增長。倘使我們只是集中關注國民生產總值等經濟數據，只是着眼於人們物質消費水平的提高，我們就正正是忽略了以上種種的問題。但事實上，工業經濟既不可能超越生產物資的限制、無止境地維持大幅度增長，「翻幾翻」；而終歸大氣層和海洋承受污染的能力也有極限。能源消耗、物質消耗及環境污染在我們跟前的二十一世紀初葉似乎已經傾側了地球大氣層本身的平衡、導致全球暖化。氣候異變等現象，在世界各地頻頻產生天災。工業文明「無止境的增長」大概瀕臨它極限之時了——這是使到很多囿於現狀的人不愜意、但卻無法逃避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sup>17</sup>

三十多年前，舒馬赫等經濟學家已經指出，依靠不斷刺激無謂的消費的工業增長，不是一種「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模式。這樣搞下去，人類只會自取其禍。舒馬赫相信人們需要放棄經濟不斷增長的妄念，從傳統價值觀念中重新思攷、訂定新的經濟發展方向。二十世紀後期，經濟發達地區居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質需要都已臻富足，實在不需要再「發展」；反而，經濟落後地區民生亟待提升，正需要適當的、可持續的發展，卻不要重蹈「無止境增長」的覆轍。因此，舒馬赫呼籲人們反省工業生產無止境地增長的信念。他相信人類的福祉需要發展適切本地環境的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推動本土生產，改進本土民生，才是可以持續的發

17 Al Gore, *An Inconvenient Truth: A Global Warning* (Paramount Pictures, 2007), 影碟粵語版片名譯為《絕望真相》，殊不貼切；參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Part II；參Davis, *When Smoke Ran Like Water*, Part II；參Kempf, *How the Rich Are Destroying the Earth*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 2008), Chapter 1 and 2；又見「港人透支生態資源嚴重」，《星島日報》(2008.12.2)（網上資料）。

展。<sup>18</sup> 污水和廢氣的流動是不辨國界、不識地域的。環境污染和保育，是全人類的問題、全球一體的問題。關注環境保育和可持續發展的人希望推動的全球一體化，雖然近年較受注目，但是其影響總不及得目前最強勢的「資本主義全球化」。<sup>19</sup>

### 2.2.3 工業生產和資金的全球滾動

資本主義的首要原則是經濟利益。提高國民生產總值、提昇社會大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是政府和學術界關心的問題；資本家營營役役的目的，不是這些「宏觀」問題，而是他自己生意的「微觀」問題，怎樣以最低的投資、收取最大的利潤。兩者往往是互為表裏的。資本家要增加利潤，得從經濟學家所說的生產要素動腦筋：就是土地、勞力和資金等等。「資本主義全球化」也跟這些生產要素息息相關。土地是「靜態」的要素，因為土地不能移動；但如果勞力和資金能夠移動，又會如何？在「布雷頓森林」協議有效的年月，資金跨國流動受到各地政府法律規限；但1973年「布雷頓森林」協議開始化解之後，國際資金的流動卻鬆動多了；與此同時，勞動力的流動——亦即跨國界的勞工流動，也在1970年代隨着廉價遠程運輸的發達，開始越來越頻仍。<sup>20</sup> 勞動力的流動最明顯的方式是輸入外勞（例如香港常見的菲傭、泰傭、印傭、以至大陸勞工等）。但外勞入境可能直接打擊本地人的就業，因而遭遇阻力。因此，資本家也得另想辦法。資本家希望以最低的成本去賺取最高的利潤；降低成本製造商品的一種主要方式，是「離岸生產」（offshore production）：把生產程序遷移到國外那些生產要素較為便宜的地方去。在這方面，香港其實是最先的主要受惠地之一，但後來卻蒙其害。在1950至1960年代，戰後香港製造業

18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Part III; Kempf, *How the Rich Are Destroying the Earth*, Chapters 4-6; 文思慧：《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生活？》（未刊稿）。

19 Kempf, *How the Rich Are Destroying the Earth*, Chapters 3-5; Luc Bouchard, *A Pastoral Letter on The Integrity of Creation and the Athabaska Oil Sands, to the Faithful of the Diocese of St Paul* (2009.01.25)（網上資料）。

20 Saskia Sassen, *The Mobility of Labour and Capi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s 1&2; Zygmunt Bauman,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開始蓬勃之時，工業產品主要是塑膠花、棉織品等，工廠都是本地的。但到了1970年代，則開始出現電子產品工廠。最先的電子工廠並非由香港商人建立，而是美國電子零件製造商看見香港勞工質素高而薪金便宜，可以為資方大大縮減生產成本，於是將電子零件的生產地從美國本土遷到香港（及其他「亞洲四小龍」）生產——由於生產線離開了美國土地，所以稱為「離岸」生產。從那時起，香港才開始有電子業，很快發展成為香港製造業的一大支柱。其他行業的「離岸生產」投資也接踵而至。在經濟成長而言，香港當然是受益者；但不可忘記，當香港受益之同時，美國等地的不少工人卻面臨失業了。<sup>21</sup>

當年，受益的香港人並沒有注意到美國工人失業的問題；而香港社會也的確好好利用機會，1970至1980年代在很多方面都有長足進展，迅速演化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但不久，生產線遷走的情況也發生在自己身上——當香港的成衣廠、電子廠等，一批又一批遷到東南亞、印度洋、更多是北移至中國大陸，我們就清楚感受到，香港有幾十萬人失去了製造業職位的苦況。<sup>22</sup> 事實是，在香港投資「離岸」生產的外國資本家發現，只要將工廠北移二十公里，無論在廠房、土地租金、勞動力等方面的成本，已能大為節省；加上較少的排污管制、較少的勞工權益保障、等等，生產成本大為下降。於是，為了追逐最低成本的商品製造，以獲取最高的利潤，廠家紛紛遷離香港北上。類似的情況在過去二三十年，先後發生在全球已工業化、經濟比較發達、生產成本比較高的地區。個別資本家即使不樂意遷廠，也因為感受到同業低成本競爭的壓力，迫着也要離岸生產。「離岸」生產自1970年代以來，是資本家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利潤的重要手段。（例如，1970年代瑞典宜家傢俬（IKEA）在香港開業時，貨品還都是瑞典製造的；如今卻已是大半「離岸生產」、貨源遍天下了。）

「離岸」製造以外，還有跨國勞務，這也是「離岸生產」的一

種，不過生產的不是商品，而是勞務。有些工種可以從甲地遷到乙地，由乙地的人擔任，利用電話、電郵等方式，讓乙地的人遠距離提供勞務。1990年代，香港匯豐銀行把若干工序移到廣州去，由身在廣州的僱員透過電話為香港的客戶處理業務。近年也有不少美國的電腦程式公司，把若干工序撥給身在印度的軟件人員，全憑電郵溝通、交貨。

然而，有某些工作是無法「離岸」的，此時僱主就需要跨國聘請外地廉價勞工來到本國提供服務。（眼前的例子就是本港的菲律賓家務傭工。從1970年代開始，當香港的經濟增長到達相當水平，本港的工資比起鄰近地區高出頗多，香港人開始聘請這些鄰近地區的工人跨境來港，負責一些無法遷離本土、而又難以聘用本地人負擔的工作，例如全日夜隨時照顧小孩、處理家務等等。這樣的安排一年比一年普遍；時至今日，已有二、三十萬招聘自菲律賓、印尼、泰國、孟加拉等地的家庭傭工在本港工作。類似現象也發生在別的「四小龍」。）本港資本家也不斷鼓吹香港的建造業、製造業，以至專門知識行業等，要輸入工資較低廉的外勞，以維持香港的「競爭力」。

我們可以見到這種勞動力流動的經濟發展模式，逐漸演變成今日「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的局面。百數十年來，世界上發達地區打工仔女（藍領的、白領的）辛苦賺來、努力爭取得到較佳的工資和權益，一下子被資本家「離岸生產」一招化解了。這些地區的中產階級都在收縮；就業機會趨向於兩極化（甚高和甚低入息猛增、中層消滅）；社會上貧富懸殊越趨嚴重。資本家只要能把資金和產品任意跨國移動（即所謂「自由貿易」），就可以從全球選取最低價的生產地；同時也擺脫了原居地政府和公民社會的各種規範與制約；更可以利用遷離、作為談判籌碼；權勢頓時大了許多。「利」字當頭，資本家決定把工序從甲地遷到乙地，主要是計算生產和運輸等成本，比較甲乙兩地的「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換言之，由資本家向全球各地招標承接他準備開設的工廠，價低者得。（當然，運輸越發達、貿易越「自由」、資金和利潤調動越便捷，越有利於「離岸

21 羅金義、李劍明合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第四部份。

22 蔡寶琮、黃家鳴合編：《媽媽姑爹論盡教改》（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02），導讀篇；羅金義、李劍明合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第五部份。

生產」。此點詳後2.3.3節。)

在商言商，資本家精打細算各地的「相對優勢」，本是無可厚非的。但各地公民社會和政府除了必須考慮經濟增長，還應顧及許多重要因素，在多種考慮、多種利益之間持平。大家可以問：資本家的利益，是否就是甲、乙兩地全體居民的利益？是否就是原材料和製成品長程運輸、沿途的自然環境的利益？是否就是消費者的利益？這是資本家不用計算，但各地政府和一般人不能不計算的。贏得這項投標、外資帶來若干份工作職位，固然是眼前的利益；但這利益也選得平衡付出的代價、或採取另類發展方式的利弊，細心比較長短。各地政府如果服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說法，在心理上已是自置於弱勢。「商業主導」的公共政策，往往無從保障本地廣大居民的利益。<sup>23</sup>

離岸生產和跨國勞工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勞力層面。影響也許更為深遠的是金融層面的資金的跨境滾動；它的威力，在「金融海嘯」表露無遺；下文2.3.2節交代。在這裏先要說明推波助瀾最大力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

### 2.3 近三十年來的「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

近三十年來的「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一方面受到上述各種因素所促成，例如「布雷頓森林」協議的崩壞、交通運輸科技的長足進展、資本家的「離岸」生產手段的收益等等，也由於1970年代起英美社會流行的一套新經濟學思潮，提供了理論基礎，在輿論界取得主導。由於這個經濟學思潮的幾位中心人物，如美國人密爾頓·弗利民（Milton Friedman, 1912-2006）等，皆任教美國芝加哥大學，所以這經濟學理論也稱為「芝加哥學派」。也有很多人把這套理論名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因為它主張經濟全面自由化——意思是說撤銷所有對經濟活動的規管。「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如果要

23 羅金義、李劍明合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第六部份。

令經濟發達，必須要容許市場全面自由運作；因為在市場上供應和需求之間的「無形之手」，會令市場運作順暢、讓經濟得以繼續蓬勃發展；相反，政府干預市場的「有形之手」——設置各種規管、或使用公帑提供各種設施和服務——只會阻礙進步。因此政府在經濟方面的角色應該盡量撤除。政府應盡量減少提供福利或推動公營事業，因為這些措施都是對市場秩序的干預；政府也應盡可能減少在經濟方面的規管與限制，任由市場自由運作。弗利民等相信若果撤除一切人為障礙，任由商人謀取利益，經濟自然會不斷增長；社會上其他人也會從商人的致富而間接受益，就像濕透了的樓房上層會有水滴漏（trickle down）到下層一樣。如果經濟出現問題，只會是由於人為因素，而非市場運作的問題。他們的信念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經濟利益是甚麼，都會很理性地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只要沒有道德、宗教、政治等信念和偏見的誤導、妨礙着他的「經濟理性」。自由市場就是這樣的每個人本着「經濟理性」、掌握着他自己的經濟利益，在市場上自由買賣的體現：人人為己致富，社會就自然興旺了。說什麼利他、公益，都不過是妨礙理性的道學家之言，是不科學的。他們鼓吹的「自由經濟」，比較十八、九世紀「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經濟學家，如《原富論》作者斯密·亞當（Adam Smith, 1723-1790），對自由市場的信賴，更為徹底——斯密亞當畢竟還是一位講究道德的哲學家。「新自由主義」針對和攻擊的對象，是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從而引伸出來的「福利國家」政策。<sup>24</sup>

由於「新自由主義」理論將一切經濟運作的重點都歸於市場，而把所有非市場的因素視為干預市場的弊病，因此就有人批評新自由主義理論是對市場的迷信，並稱之為「市場基要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sup>25</sup> 把它批評得最為透徹的學者之一，是另一位當代美國經濟學家，任教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史德格拉茲（Joseph Stiglitz, 1943- ）。史德格拉茲不是反對自由市場；但他指出，市場

24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hapters 4 and 5.

25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xi-xv.

若要真正地自由運作，參與市場買賣的人都需要享有自由和平等的資訊。但完全自由和平等的資訊是不可能實現的，也不可能只是依賴市場本身來維持。有財有勢的人，在市場上佔有巨大的優勢；不是小投資者或消費者能夠隨便抗衡的。大資本家在資訊方面的優勢也是壓倒性的——例如：內幕消息、專門知識、以致宣傳廣告的運用和對傳播媒體的操控、等等。因此，完全自由的市場是不可能的；必須由民主法治的政府，加以適當的監管，才能夠建立和維持正直、公平和透明的市場運作。他的「信息不對稱 (information asymmetry)」研究，贏得了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sup>26</sup>

我們可以舉一個眼前的實例，說明史德格拉茲「資訊不平等、市場不自由」的要點：在「金融海嘯」中血本無歸的香港「街坊」小投資者，他們購買「雷曼兄弟迷你債券」(Lehman Brothers minibonds)之時能夠掌握得到的市場資訊，肯定不會及得向他們推銷這些債券的銀行、投資顧問，對美國「次按」放債情況的認識，更不會及得發行債券的雷曼兄弟公司。資訊不平等，明顯是市場「自由」運作的致命傷；因此，市場是需要公平的政府設立規限，實施監管的。<sup>27</sup>

「新自由主義」原來只是芝加哥學派一套紙上談兵的學說。然而，197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智利策動了政變，推翻了智利當時的民選總統、左派的薩爾瓦多·阿延德 (Salvador Allende, 1908-1973)，改由智利軍人奧斯都·皮諾切特 (Augusto Pinochet, 1915-2006) 獨裁，實行血腥的高壓統治、捕殺成千上萬異己人仕。皮諾切特矢志摧毀智利實行已久的「福利國家」模式的社會制度，掌握政權以後，諮詢手下留學芝加哥的智利籍經濟學家，並邀請了他們的老師弗利民等一伙到智利主持經濟「自由化」的改革。1970年代中期，智利的經濟在這批「芝加哥兒郎」(Chicago Boys) 手上弄得一團糟、民不聊生；然而在英國和美國主張縮減「福利國家」、削弱「入息再分配」的保守

黨和共和黨眼中，智利軍人政府的經濟改革卻實行得非常成功，因為它有效地摧毀了智利的「福利國家」社會制度。

就在智利軍人獨裁政府讓芝加哥學派推出「市場基要主義」的實驗的同時，英美的政治情況也有所改變：1979年英國選舉保守黨右翼的瑪格烈特·戴卓爾夫人 (Margaret Hilda Thatcher, 1925 - , 1979-90任首相) 出任首相；稍後，美國共和黨右翼郎奴·列根 (Ronald Wilson Reagan, 1911-2004, 1981-1989任總統) 贏得了1981年的總統選舉。英美兩國政府也相繼採納芝加哥學派的建議，一方面把公營事業私有化，鼓勵更多商業競爭，另一方面放寬國內的經濟規管，例如放寬交通工具 (鐵路、貨櫃車等) 的修檢規章，取消「新自由主義」學派認定是妨礙商業營運的好些規定。這些放寬措施往往是與運輸的安全相關的。在管制放寬初期，經營運輸的公司爭相減價；它們因為安全檢查及零件更新等方面人力物力成本節省了，利潤增加而收費也可以便宜些，營運者和消費者都受惠。因此，政策也相當受歡迎；輿論界都稱頌「有競爭才有進步」。但是，由於缺乏安全檢查及維修不足等問題，過不了多少年，像貨櫃車車輪飛脫等交通意外便多次發生。另一方面，政府公營事業，像鐵路、水塘等，很多被政府出售，轉為私有。例如，戴卓爾夫人擔任首相期間，原屬公營事業的鐵路運輸系統被政府出售，轉由商業機構擁有，改為以牟利原則管理。大家還記得前幾年鳳凰衛視名記者劉海若在英國觀光期間遇上火車意外，差點喪命。那段時期，英國頻頻發生火車出軌的意外；一連串火車意外事故，全都出現在公營轉為私營的鐵路系統之內。究其原因，私營化的鐵路公司為了賺取最高利潤，致力減低營運成本；而政府又對交通工具放寬規管，鐵路公司也就裁撤了看似游手好閒、但卻熟悉每段路面情況的專責安全檢查員，代之以兼任多種職能、同時兼顧多處路段、對路面狀況不可能有深切認識的檢查員；又削減維修經費，延長各種零件規定更新的期限。這樣就導致鐵路列車及路軌嚴重失修，接二連三發生重大事故。同理，私營化的水塘也頻頻出現衛生檢查疏漏，以致食水傳播病菌等情況。

26 Marc Hayford, A.G. Malliaris and Mary E. Malliaris, *The Global Economy: Financial, Monetary, Trade and Knowledge Asymmetries* (Toronto: APF Press, 2003).

27 《明報》「新鴻基證券原價回購迷債·與証監和解·8500萬賠予310人」(2009.01.23) (網上資料)。

英美政府於1980年代開始放寬對國內經濟的規管，並致力削減政府在民生方面的開支，將不同的公營事業私營化；一方面積極游說人民，指以上所有措施是為了「有競爭才有進步」，「尊重市場規律」，市場運作順暢，就會令整體經濟良好，對大眾都有利；另一方面則以減稅籠絡人心，指政府縮減公帑支持的活動、削減各類開支，政府財政負擔較輕，即有減稅的空間；減稅就是「還富於民」，可供人民在市面擴大消費，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兩國也有不少商界大亨，從來就反對凱恩斯式的「入息再分配」的累進稅政策。他們紛紛收購傳媒，改變編採方向；又捐資大學、投資智庫，致力扭轉輿論。一二十年間，「新自由主義」的呼聲在英美社會日漸漲大。「自由競爭」、「用者自付」、「寓富於民」、「自力更生：社會福利養懶人」等「市場基要主義」的觀念，幾乎成了一般人的共識。<sup>28</sup> 這樣，戴卓爾、列根和他們的政策繼承者（像布殊父子等）即可繼續拉攏人民的選票，以維持其政權並令相關的「自由市場」政策繼續推行。2008年的「金融海嘯」，讓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看清楚一點「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可能引發的禍害，輿論也較具批判性——例如質疑「貪婪真是好的嗎？」。此後民主選舉的結果，也許會帶動又一次經濟理論和政策轉型。

英、美公營部門的改革很快就蔓延至教育界。在政府眾多公營部門之中，教育、醫療及失業保障等，往往是開支最多的。西方「福利國家」的失業保障制度，原意是在「商業週期」之中積穀防饑，為不景氣時短暫失業的人，提供基本的入息保障，既可免他們饑寒之苦（有點像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同時也保持社會整體的消費能力，避免經濟不景惡化。但是一旦某些人失業是長期的（例如工廠遷往「離岸」一類的「結構性失業」），失業保障卻變成了政府的長期負擔，而失業人仕的經濟能力和自信心、自尊心都消磨殆盡了。戴卓爾夫人、列根等國家領導人在推行失業保障改革時，強調的是「新

28 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主編：《誰出售了香港—領匯事件的思前想後》（香港：明報出版社，2005）；林瑞含主編：《香港邊緣勞工口述》（香港：樂思會，2002）；葉蔭聰、林藹雲主編：《窮人係懶人？》（香港：街角，1999）。

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人人為己」的觀念，往往以政府失業保障「養懶人」為由、而大幅度削減這方面的支出。有些人濫用失業保障是不爭的事實，但主張削減的政客和學者，卻忽略了大部份長期失業者其實都是經濟結構轉變造成的，而不是因為懶惰不願工作。<sup>29</sup> 當然，固有的失業保障制度只能照顧週期性的失業，不足以應付經濟結構轉變的新形勢。而若干西方政府濫用凱恩斯式的干預手法，以致長期赤字預算，也是實在的問題。舊制度無疑是需要改革的。但把罪咎歸到失業者，卻只是反映出崇尚私利競爭，弱肉強食的意識形態；要推翻社會大眾守望相助、同舟共濟的公民價值觀。由此可見，戴卓爾、列根政府的措施，都與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所提出的相反；「市場基要主義」的出現，目的是拆掉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所支撐的「福利國家」制度，把英美社會帶回到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賀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意識形態方向。<sup>30</sup>

### 2.3.1 「貪婪是好的（Greed is Good）」

弗利民的經濟學理論畢竟比較抽象，難以普及；戴卓爾夫人、列根等人推行的政策，一宗一宗地鼓吹起來，造成勢頭，但還需要借用民主民生的包裝來推銷，在一般人心目中不容易連貫起來、窺其全貌。流行文化的作品則可以避重就輕，於溫情故事的字裏行間宣揚「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理念、以至人性觀念，更有效地改變讀者的思想和價值觀念。

二十世紀後期在英語社會鼓吹「理性私利」最成功的是美國俄裔作家艾茵·蘭德（Ayn Rand, 1905-82）。她的小說《阿特拉斯擺脫重負》（Atlas Shrugged），成書於1957年，1970年代後一紙風行。這部小說講述一羣知識份子和專才，各自經過一番內心掙扎以後，

29 葉蔭聰、林藹雲合編：《窮人係懶人？》（香港：街角，1999）。

30 James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拒絕再遵從利他的、合羣的道德規範，決志要實行利己的「理性」行為。這本書攻擊「福利國家」和入息再分配等凱恩斯理念、及社會福音等理想，不遺餘力；為「新自由主義」信念和價值觀念的普及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她的朋友圈子有不少人日後在列根、布殊執政時，位居美國政界和財經界要職；長期任職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中央銀行行長）的阿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1926- ；1987-2006任主席）是其一。<sup>31</sup>

千多頁的小說，還不是人人會讀的，荷里活電影更能深入民間。1987年賣座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更為「新自由主義」和「理性私利」創出了萬眾的口頭禪。電影故事取材自1980年代美國財經顧問伊凡·包思己（Ivan Boesky, 1937- ）的事跡；此人專搞「兼併」和「套利」，成為億萬鉅富；應邀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商學院作畢業禮演說，宣稱：「貪婪是健全的……你會感覺良好。」雖然不久以後，他被控告內幕交易，充當污點證人，得以免罪、但失去財富。電影角色的下場卻比較含糊，而扮演的演員則贏得了當年最佳男主角獎。<sup>32</sup>包思己的名言，也經由電影角色之口，成了近二十年來美國商界和不少社會大眾的口號和座右銘：「貪婪是好的（“Greed is good”）。」今天上Google網查閱“greed is good”，竟然開列數百萬條資料，其影響可見一斑。也有評論家說艾茵·蘭德就是「貪婪是好」此語的教母；時代產物一氣相通，是明顯的。

### 2.3.2 從英美到世界各地

英美國內的經濟改革，也因為「自由貿易」的措施而帶動了全球各地的改革。根據「市場基要主義」，如果市場是主宰一切的話，主宰的就不應限於國內的市場，也應涵蓋着全球性的跨國市場。換言之，在跨國市場的大前提之下，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障礙也必須減低以至消除，這包括降低關稅、容許不同形式的跨境運輸、甚至是廢止各

31 Wikipedia, “Ayn Rand”（網上資料）。

32 Wikipedia, “Wall Street (film)”（網上資料）。

國對國內經濟生產和一般居民的各種津貼、等等。後者例如，本港的公共房屋措施，就曾被鼓吹「自由貿易」的一些外國批評家指責是政府對本港廠商的的津貼；他們提出的理由是：政府向勞工階層提供廉價住屋是對市場的一種干預，其效果是減輕了工人的生活負擔，讓資本家不須向勞工付出較高工資，勞工階層也有能力支付生活所需；於是，本港廠家的薪酬成本較低，他們出口貨品的價格自然也較低，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就「不公平地」增強了。因此，「自由貿易者」聲稱，假如香港貨品要與國際上其他產品進行「公平」的競爭，香港政府就需要取消對資本家的各種津貼——換言之，香港政府需要取消對本港低收入階層提供廉租公共房屋服務。香港市民一般認為是港府的一項民生政策，在「市場基要主義者」眼中卻成了一種不合理的出口津貼，一種妨礙國際市場自由運作，因而需要剷除的惡習。類似的邏輯，也應用到其他地區的各種民生、文化和環境政策。

這種論調，不時在世界各地的貿易談判桌上提出來。為了推行「自由貿易」，較為富有的國家、或出口貨品價格比較高的國家，往往會要求出口貨品價格較便宜的國家降低或取消對國民生活保障的承擔（例如糧價補貼或管制等）。這樣，在「自由貿易」的口號之下，1980年代以來陸續產生了一系列的貿易協定，包括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之間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簡稱NAFTA），以及其他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定等等。在經過多番談判以後，世界貿易組織，簡稱「世貿」（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終於在1995年成立。（香港是創始的會員之一；1997年後，本着「一國兩制」的原則，仍是「世貿」的會員。）「世貿」是一個國際官僚機關，由各「會員國」的貿易部長所組成；而由各「會員國」公務員團隊組成的秘書處，則在瑞士日內瓦的「世貿」總部辦事。這些人員平日的主要工作，是處理來自不同國家的投訴。就以上述有關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爭議作個虛擬的例子說明，假使有某國拿着上述的論調，指責香港出口貨品的價格便宜是因為香港政府津貼資本家，它可以到「世貿」提出正式控訴，指香港政府進行不公

平的貿易；「世貿」專責審裁小組的裁決，可能就會要求香港政府根據「公平貿易」的原則，取消對本港低收入人士住屋的津貼。從這個虛構的例子可以看到，「世貿」有權基於各國措施是否有違世貿協議內的「自由貿易」或「公平貿易」原則，要求各會員國改變其國內民生、文化等方面的政策。<sup>33</sup>

換言之，「世貿」得以維持國際貿易公平為理由，干預及左右各國國內各種政策和措施的實行，包括一般不算是貿易或經濟層面的政策；國際貿易就這樣凌駕在政府施政和社會生活各層面之上，儼然一切以營商的價值觀治國（商業主導）。「世貿」也就這樣成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大推動力。

1983年，戴卓爾夫人召集了英美和歐洲十多個「保守派」政黨的領袖到倫敦開會，並成立了所謂「國際民主聯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Union, IDU）」，作為反蘇聯的壁壘，又協力宣揚「新自由主義」思想和政策，及在選舉策略上互相支援。蘇聯解體以後，這個聯盟還繼續存在，為推廣「新自由主義」出力。在1990年代，漸漸形成了所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影響更大。<sup>34</sup>這是由美國的政治勢力和英美的經濟勢力，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下的一套全球性經濟和社會策略。為什麼名為「華盛頓共識」？上文提到，在1940年代成立的國際金融機關，如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等，總部皆設在華盛頓；同時根據這些機關的成立章則，美國總統對它們的總裁人選擁有決定性的提名權或否決權。再者，由於美國政府財雄勢厚，這些國際金融機關在眾多議題的討論上，都需要諮詢美國財政部長的意見。所有諮詢等程序都是黑箱作業的，因此這種情況幾十年來一直不為大眾所注意。然而到了1980至90年代，美國總統列根（1981-89任總統）及老布殊（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1924-，1989-93任總統）先後執政期間，美國政府對這幾個國際金融機關的干

33 羅佩珊、畢雁萍、安中玉編：《三位一體的世界、貿易、組織：基督徒於世貿事件中的反思》（香港：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2006），理論篇。

34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hapter 4.

預越來越強硬，以致大眾發現，美國財政部與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三者往往在國際貿易及國際金融問題上採取同一立場。它們之間的理念，也就稱為「華盛頓共識」了。（「世貿」總部雖然不是設在華盛頓，基本理念還是共通的。）這套共識，大體上反映了芝加哥學派「新自由主義」對國內社會經濟政策和世界經濟的看法。遇有某些國家的經濟或金融危機，急需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或發展中國家向世界銀行貸款進行各種建設，它們的貸款方案，都被迫要符合「華盛頓共識」對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要求。1990年代末亞洲金融風暴之中，及大概同時期俄羅斯和南美洲的經濟危機之中，「華盛頓共識」都發揮了威力，硬推芝加哥學派的理念和措施。

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另一個沒有實際權力但有重要影響力的組織也崛興了起來。一位瑞士商人從1971年開始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逐漸得到各國大商家的支持，多國的政府官員也看在他們的份上而出席。到了1990年代，在瑞士達沃斯（Davos）渡假村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成了各國財經界、工商界、政要和傳媒大亨每年最重要的聚會。雖然這個論壇只是與會各人談天聯誼的場合，但事實上有很多非正式的協商、談判及協議都在論壇期間進行。當我們收看電視新聞，得悉這個論壇年復一年地舉行，看來毫無新意，也就容易忽略它的重要性；實則有很多重要的「枱底交易」及談判都在此進行。即使沒有任何交易，達沃斯論壇也是「新自由主義」的信眾定期互相激勵，互相堅定信念，同聲宣揚自由市場福音的大團契，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廣播塔。<sup>35</sup>

「世界貿易組織」、「世界經濟論壇」與「華盛頓共識」的成立及其影響，使得「芝加哥學派」所推廣、戴卓爾夫人、列根政府所採納的這種「市場基要主義」的「市場至上」、「人人為己」思想傳播到全世界。其影響力，並不只限於經濟方面，同時影響到各國的內政，包括教育、福利及醫療等問題，例如醫療融資的討論，要把公帑

35 Richard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98), Chapter 3.



負擔轉嫁私人，即為一例。<sup>36</sup>

### 2.3.3 脫韁的金融體系

「市場基要主義者」當然也主張勞動力和資金的自由流動，不受任何疆界和政府的規限。上文已指出現代運輸和通訊科技，助長了「離岸」生產和勞務的發展。電腦科技的猛進和普及，更促進了跟製造實物商品無關的資金的環球流動，達到從前無法想像的地步。1987年10月27日，當時由戴卓爾夫人領導的英國政府，決定放寬英國倫敦股市的資本及證券市場，取消了很多行之已久的嚴格規管。規管取消以後，一眾頭腦靈活的財經界人士自然好好利用這機會，推出了不同類型的「投資產品」，就是現時我們耳熟能詳的「衍生工具」（derivatives）和「互惠基金」（mutual funds）等等。<sup>37</sup>「貪婪是好的」得到充份落實的機會。

在出現這些無形的「產品」之前，投資者參與股票買賣只是購買就近的股票市場上市的某一種、或某幾間公司的股票；買來股票，通常是準備長期持有，按時收取利息；當然也希望它長期會升值，但一般不打算隨時買賣。短期視股價上落而反覆買賣股票，被看作不健康、不負責的投機活動（speculation）而不是投資（investment）。有了所謂「衍生工具」與「互惠基金」，投資者可以購買某一互惠基金或投資公司的證券或票據，而該互惠基金或投資公司的經理，集合了成千上萬位投資者的資金，根據自己的分析判斷去購買多種股票——有本地的、有外地的、有跨國的。基金經理專責投資，對各類股票的認識理應更深入，更能掌握遠近股市的情況，比起一般投資者較為有優勢；手上拿着千千萬萬人委託的鉅款，財雄勢厚，甚至能左右某些股價的升降。代人投資退休基金（例如香港的「強積金」）的經理，

更是掌握億萬資金。事實上，投資者並不清楚基金經理或投資公司用自己的錢購買了哪些股票，只是信賴這些公司或基金掌握了專門知識和最新資訊，能夠選擇全球最賺錢的股票。總言之，只要這些互惠基金或投資公司的股價升值，投資者的賬面資產就會增加；因此，投資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投入的資本流向哪些股票，亦毋須了解，更不用親身經常買賣。基金經理賺取的是買賣證券的佣金，自然急功近利，沒有耐性守候股票按時派息，而是要從股票上落與股票買賣之中，取得每一季度的最佳「業績」（performance）。買基金的顧客，也依賴「評級機構」評估各種股份、基金的「業績」，作為判斷每種「投資產品」優拙的標準。這樣「投資」與「投機」的界線模糊了，而大多數無意投機的投資者，他們的資金，也在基金經理手中化作了投機的「熱錢」。

這種投資方法，對投資者來說無疑是較為方便，因為投資者毋須花大量的時間與資源去了解研究本地的股票，更遑論全球各地眾多股票的走勢與企業的狀況，但卻能依賴互惠基金的「專家」去投資世界另一端一些自己並不認識的股票。當投資者購買互惠基金，其實是購買「股票的股票」，而非購買股票。所謂「衍生工具」，就是架床疊屋的股票結構，即「股票之股票之股票之股票之股票」，往往是經由十分複雜的數學方程式計算出來的。<sup>38</sup>

舉個實例說明，雷曼兄弟「迷債」一類的債券，就是以小額債券的形式，彙集世界各地小投資者的資金；得來的鉅款，輾轉借給美國各地的財務公司；而這些財務公司則放債給不符合正常按揭條件的貸款人讓他們買房地產，收取高利息；是為「次等按揭」或「次按」（subprime mortgage）。只要房地產不斷升值，負債人即使無力月供按揭，必要時也還可以棄屋抵債。一旦由於美國小布殊政府入侵伊拉克，師老無功，負擔日重；而美國民間長期濫簽信用卡、「先使未

36 羅金義、李劍明合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第三部份。

37 參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書中Manuel Castells, Paul Volcken及George Soros 各章；又見Bethany McLean and Peter Elkind, *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 The Amazing Rise and Scandalous Fall of Enron* (New York: Portfolio, 2003)。

38 Kenneth McRobbie and Kari Polanyi Levitt, Karl Polanyi in Vienna: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9)，書中Eric Helleiner及Fred Block各章。

來錢」的惡習也積重難返；到了2006至2007年間，房地產市場無以為繼，整個「次按」的疊卵局也就眨眼之間瓦解了。支付不起按揭供款的人紛紛喪失家園；美國各地不負責任地放債的地區性財務公司先後倒閉。如果沒有「衍生工具」的投資方式，金融危機大概就會停留在這個層面，不致進一步蔓延。有了「衍生工具」，就連美國最大的銀行，也因為買下太多「次按」輾轉包裝而成的證券，而負上了不堪的壞賬。<sup>39</sup>「資本主義全球化」風吹所及，香港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小投資者也因為買了美國規模最大、信譽最好的銀行的某些證券，不知不覺地間接捲進「次按」漩渦，直接蒙受其害。由於「衍生工具」太過複雜、包裝太不透明，即使大銀行、大顧問行的專家，往往也弄不清楚它是甚麼葫蘆賣什麼藥，「次按」危機爆發時，都無法算清自己的機構牽連有多大；美國小布殊政府要救市，也不知道潭底尚有多深遠，以致手足無措。近者大者尚不知情，更遑論遠在天邊的小投資者了。

有了「衍生工具」和「互惠基金」，股票的類別與組合越來越多、構成也越來越複雜，投資者的情感也產生了變化。投資自己認識的公司，除了金錢的投入，還有感情上的認同，彷彿是參與了這公司的生意，跟公司的主導者和僱員多少有點憂戚與共的感覺。投資基金或衍生工具，連什麼生意、什麼地域也不知道，持與放全憑一個「利」字，完全看指數和「業績」和「評級機構」的評級；錢也許是賺多了，但情感上卻更空虛了。既然「貪婪是好的」，也管不得這許多了。<sup>40</sup>

從宏觀看，過去二三十年的發展，也做成「金融經濟」（financial economy）跟「實體經濟」（real economy）（實質的士、農、工、商等事業）脫節。在現實中，來來去去畢竟只有一定數量的企業，雖有增長，但規模上總仍有實事實物的限制。金融業方面則不

39 Felix Salmon, "Recipe for disaster the formula that killed Wall Street", Wired Magazine (2009.02.23) (網上資料)。

40 劉典復：「股場苦戀」《世界日報》（多倫多版 2009.03.15），頁C8。

然；因為「衍生工具」等的架床疊屋，多出了很多額外的股票類型及投資方式；每一層、每一疊、每一次交易，都各有它的賬面價值，互相積累起來。在1997年，即倫敦股市資本及證券市場被戴卓爾夫人放寬了以後才十年，有人計算出當時「衍生工具」的總市值已是相等於全球實體經濟生產總值的12倍！這當然並不等於全球經濟生產總值多了12倍，而只是在形形色色的投資組合、投資方式之下計算出來的賬面市值。<sup>41</sup>換言之，雖然投資者同樣可以拿着投放在「衍生工具」賺取的金錢用來花費，但這些從新興金融「產品」賺來的金錢，卻並非建基於某些企業的實際的經濟活動、業務情況或存在的實物產品，而只是生自遊戲一般的股價業績。一旦遊戲告吹，泡沫爆破，要找到半點實物都沒有；但玩遊戲時欠下的債項，倒是真實而逃不了的。

1998年也有人計算出，每日全球外匯的總額，已超過英國當年的經濟生產總值（GDP）。何以全球外匯額每天竟然可以超越英國如斯大國的全年經濟生產總值？是誰滙了那麼多的金錢？<sup>42</sup>一方面，受惠於倫敦股市資本及證券市場的放寬，眾多新型的投資「產品」及投資方法得以推出；與此同時，政府放寬規管，加上電腦科技的發達，容許資金跨境流動的數額年年遞增。電腦科技讓不少人都可輕易透過互聯網，即時聯繫到世界的另一個角落。這樣，現今世界上有不少人在下班以後（或乾脆辭掉了工作），在家中對牢電腦、按動滑鼠，控制及處理在幾萬公里以外的投資。依照往昔的方法，投資者需要找股票經紀、將資金授權予他進行投資；經紀則需要到股票市場進行買賣。使用這種舊式的交易方式，股票交易的速度自然較為緩慢；但有了現時用電腦進行投資的方式，投資交易的人數、速度和頻率，都輕易大幅度提高。於是，投資的總金額也就快速倍增了。全球每天的外匯總額，因而也就超過英國的全年實體經濟總值了。

還有一個驚人的數字。1998年的統計，當時每日全球外匯成交的

41 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 *Global Capitalism*, Castells的論文；David C. Korten, "Money as a social disease", (PCD Forum Paper, 20 May), 1997, www.pcd.org/1997/money.htm (網上資料)。

42 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 *Global Capitalism*, Castells的論文。

總金額竟高達一萬億美元！如果把一萬億美元全換成一百元紙幣，從地面疊起，其高度竟可達到一百二十英哩，是世界之巔珠穆朗瑪峰的數十倍高度！<sup>43</sup>

這種不是靠着投資生產實物商品或實際勞務、按時抽取利息，而是憑藉股票每天、每月價位上落的「業績」賺錢的投資形式，在「新自由主義」撤除規管的市場體制下，很快發展得非常蓬勃，在二十至廿一世紀之交，成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主流，又稱為「新資本主義」（“New Capitalism”）。「新資本主義」對實質產品的質素、銷量和與之而來的利潤的重視，不及得關注股價上落的業績——因為股東對管理層的取捨，一般都看股價上落而決定。因此，管理層處處追求「彈性管理」、「精簡架構」，以博取基金經理的青睞，從而推高股價。於是不時可見某某公司明明是盈利的，卻要裁員；而裁員消息宣布之後，股價隨而飆升；「評級機構」也給它升等。這也是符合「理性私利」的。<sup>44</sup>

近二三十年來財經交易金額增長速度驚人，令到小部份人迅速致富。但架床疊屋的財經業務，建築在增長不大的實體經濟的基礎上，是非常不穩妥的。民生方面，多半的人並沒有實質的改善，甚至在某些地方更出現倒退。世界各地在「新資本主義」急速推展之下，人們的就業和入息都日漸「兩極化」。就是說，社會上少數人富裕得越來越難以想像；入息低、生活困苦、朝不保夕的人越來越多；而中產人仕在社會上的比例則越來越低。這種趨勢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大方向是相反的，但似乎是「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通例。所謂「後工業社會」，乃指本來依靠工業生產繁榮起來的社會，由於資本家離岸生產、工業流失，導致很多工人失業；工業不再是這個社會的經濟重心。同時資金大量流入「金融經濟」、脫離「實體經濟」，從事高薪（如金融）和低薪（如快餐店）勞務職業的人，比例

43 參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 *Global Capitalism*, Castells論文。

44 Richard Sennett,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7-39.

都越來越高，而中等入息的人卻持續減少。貧富懸殊日甚，在富庶的「後工業」社會之中以香港的情況最為嚴重。<sup>45</sup>

### 2.3.4 大自然的負擔

「離岸生產」促進了工業文明在世界各地的擴展；資金流動增加了一小部份人的收入和購買力，也助長了消費品的生產和銷售；兩者都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形式，對於整個世界的自然環境也帶來衝擊。自十九世紀開始，大國資本家已進行跨國的資源掠奪。隨便舉個例子，1890年代德國為了獲得礦物資源，於是強行在中國山東省劃出「勢力範圍」，從青島興建鐵路到山東內地，以方便開採當地的礦物資源，終於激起了排外仇教的義和團事件。同類事情也發生在非洲、南美。然而，廿一世紀的資源掠奪模式已不需要事先進行土地侵略，純粹依靠科技及資金投資的方式事實上已可做到，而且規模可以更為龐大。今天東西方列強的石油公司在非洲蘇丹西部達爾富爾（Darfur）地區開採石油，便是靠著支援蘇丹的軍閥，讓他們威嚇和殘害當地百姓，不用再花費成本建立殖民地了。

工業生產增加了，廢料也隨着多起來。資本主義全球化另一類影響是排污的轉嫁。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社會的工業污染都是就地棄置的。流經倫敦的泰晤士河經過百年污染，在1950年代已經久無活魚；倫敦的「濃霧」也成了當地的標誌。但當西方社會的環保運動開始熾熱起來，普羅大眾不再容忍資本家像以往一般隨便丟棄工業廢棄物；政府毅然立法規管排污，逐漸，泰晤士河和不少西方國土的水域也復甦了。<sup>46</sup> 資本家無可避免要出錢處理、或把工業廢物運到遠方棄置。於是有人提出，第三世界的國家缺乏的是金錢而有的是空間，只要向貧窮地區政府提供金錢利益，即可將工業廢料運往第三

45 阮美賢、陳慎慶、龔立人等：《全球化與香港教會：神學工作小組匯報、勞工、公共服務私營化、旅遊、投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等，2006），第一章；蔡寶琮等《千針萬線：香港成衣工人人口述史》（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8），附錄一。

46 Davis, Chapter 2。

世界丟棄，也不會有有人反對，要反對也不難應付。這樣的建議甚至提呈至世界銀行進行討論。

當時是1991年，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師羅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 1954-）寫了一張說帖贊成這項建議。他純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指出第三世界國家的土地便宜，因此在該處買地設立廢物堆填區，棄置有毒的工業廢料，成本也比較便宜；而更重要的是，第三世界的人命的代價也較為低廉——工業廢料之所以不能在富裕地區丟棄或處理，正是因為這些工業廢料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傷害；但要是把廢料運到第三世界丟棄，即使會對當地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造成威脅，但由於第三世界的人命較賤，當地的人健康受到影響，往往不用賠償，即使要的話，醫療費用也會較為節省。<sup>47</sup>

薩默斯<sup>48</sup>是基於純粹「經濟理性」的分析，以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身分，主張把發達國家的工業廢料運往第三世界堆放。然而，他的這份說帖不知如何洩露了，引起公憤，以致在世界銀行的層面這項建議無法實行。雖然排污轉嫁無法取得世界銀行的支持，但至今仍然不時可以讀到有關工業廢料運往中國某些偏遠山區、或世界上別的貧困地區的新聞報道；例如，發達國家的報廢電腦，大部份是運往印度、中國或非洲，在窮鄉僻壤由人手拆毀，回收有用物資，及棄置不能回收的廢料；造成地方環境污染及衛生損耗。這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面。<sup>49</sup>

「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理念是要促進世界各地進出口買賣，不受到關稅、配額等人為阻隔，好讓任何一處地方都本着它的「相對優勢」生產它的特產，賣到別的地方，賺到錢再從外地買入那些本地缺乏「相對優勢」的物產。所謂「相對優勢」，就是從做

47 參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 *Global Capitalism*, Vandana Shiva的論文。

48 薩默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任滿離職後，曾任美國克林頓總統的財政部長，及後更成為哈佛大學的校長。然而他擔任校長期間，發表「女人天生不如男人」的言論，遭哈佛多數師生指責為性別歧視，失去校內師生和社會上知識界的信任，在任一年被迫下台。2009年初重返政壇，現職白宮首席經濟師。

49 “Much toxic computer waste lands in Third World”, *USA Today* (2002.02.25) (網上資料)。

這門生意的商人的角度看，也就是一間公司的成本和利潤的高低。如果這公司在甲地生產某種商品，計算了原料、場地、工資、運輸等，所需成本高於乙地，就是甲地缺乏「競爭力」，不宜投資。這樣的計算，是沒有考慮資本家的投資和利潤以外的因素的。忽略了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遠程貿易消耗的能源，除了資本家付出的運輸費，還有全球所有人和物種共同承受的污染。我們走進超級市場，即使當下是冬季，也能買到夏季的蔬果；這在往昔是不可能的。我們讚嘆着一年四季皆可隨意享用各樣廉價蔬果之餘，即使我們注意到這些蔬果原產地有多遙遠，也不一定意識到運送這些蔬果所需要的成本。遠程貿易為消費者帶來很多方便，同時當然是資本家獲利。資本家在成本極低廉的地方生產，即使加上較昂貴的運輸費用，仍然有較大的利潤。然而，自然環境付出的代價，資本家卻未有計算在內，因為這不是他需要掏腰包的。

環保學者指出，美國出產的雞隻，由屠宰直到送進消費者的口中，往往需要經過2000公里的路程；運輸一隻死雞消耗的能源，大於生產這頭活雞。據估計，生產一隻雞，從雞蛋孵化到屠宰、包裝、販賣雞肉給鄰近的消費者，整個過程排放出“x”個單位的二氧化碳，而遠程貿易把雞隻運送2000公里所產出的二氧化碳則是6x至12x；因為運送冰凍雞隻的貨櫃，冷藏和運輸所燃燒的燃油會產出大量二氧化碳。<sup>50</sup>（從美國運到亞洲，更是再遠幾倍的距離、多排放幾倍的碳氣了。）假若沒有這樣的遠程貿易，我們回歸到往昔的生活，只吃本地出產的農產品（所謂“locavore”），自然就是隨着季節吃不同的食物，正如孔子教導，「不時不食」（《論語·鄉黨第十》）。這樣，豈不是省下遠程貿易的運輸成本及所消耗的資源，也給本地和鄰近的農戶多一點就業機會、還他們多一線生機——那怕他們缺少一些「相對優勢」？要不是資本家急着要利用遠程貿易，以求「相對優勢」賺取最豐厚的利潤，死雞根本不需要展開其數千公里長征；環球「自由貿易」也不一定是必然的、不一定是神聖不容置疑的。

50 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 *Global Capitalism*, Vandana Shiva的論文。

「自由貿易」是「相對優勢」的自由轉運，卻不一定是互通有無的買賣。當然，倘若遠程貿易所運送的是一些絕對需要的物品，這物品只能由甲地生產，在乙地卻是缺乏的必需品，這樣的遠程貿易是合理的，不應阻撓、不應妄加屏障。但若果是一些本地可以生產的產品，只因資本家在本地生產的成本較高，不符合他的如意算盤，而刻意選擇在成本較低的偏遠地方生產，再遠程運送到高消費地區，以增加利潤；這樣的遠程貿易，對本地人的生計損折和對環境所造成的污染是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目前有不少遠程運輸的貨物是半製成品：資本家精打細算，把一條生產線的各階段，分拆到不同地方，以賺取最高利潤。）在「自由貿易」主導之下，資本家的賬目之中，成本並不包含消耗大自然資源或污染大自然所付出的代價——因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政客，都不主張收取「寓禁於徵」的污染稅。因此，污染環境的代價是全人類、全生物界共同付出的。生產和運輸排放的二氧化碳愈多，地球暖化愈嚴重。終於貽禍子孫——這也是「利潤私有化、成本（和風險）社會化」的實例。<sup>51</sup>

因此，有人就指出，不必要的遠程貿易及排污轉嫁等「資本主義全球化」手段，對第三世界來說，不能視為“global village”（地球村），而是應該看作“global pillage”——「環球搶掠」。<sup>52</sup>更有甚者，是在「全球化」的名目下，一些富裕國家對第三世界生物產權及知識產權的掠奪，同時也是強加諸大自然的一種負擔。傳統農業在世界各地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幾千年來，農人累積了很多知識；這些知識一般是世代口耳相傳，不曾寫在書本裏，但仍是很有價值的，也往往是農村生計所繫。關於農作物品種的知識，就是顯著的例子。經過農人幾千年的栽植、選種、配種，光是稻米，世界各地各有千百種不同的品種。傳統農人了解自己鄉土的土壤和氣候，從而判斷出哪一品種的稻米最適合在該時該地生長、可以得到最好的收穫。農人春耕時，先預測今年天氣乾旱或是雨水充沛，從而判斷今年的天氣應要

51 Kempf, *How the Rich Are Destroying the Earth*, Chapters 1 and 2.

52 Jeremy Brecher and Tim Costello, *Global Village or Global Pillag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Bottom Up*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4).

種植哪一品種的稻米。這是傳統農民的智慧與經驗，跟大自然互相配合、共存、互利的經濟實踐。這些傳統智慧並不擁有資本家認定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因為農民沒有把傳統知識寫下來，拿到專利局登記。然而，假若某跨國農業公司的技術人員偷窺農人這些傳統智慧的運作模式以後，就着某一品種的稻米或某一種的種植方式申請專利，宣稱擁有該物種或該種植方法的「知識產權」；以後每當有農民企圖使用這種方法、或種植該品種的稻米，就需要得到該企業的批准、甚至要繳付專利費，否則可能被控侵犯了大公司的「知識產權」。農民當然不懂得將傳統務農知識登記或申請專利，因為這些傳統智慧其實是農民世代相傳、大家共同享有的民間知識，從沒有人會想到把它私有化；然而跨國農牧企業卻把這些屬於大眾的知識藉着申請「知識產權」，奪為己有，令這些傳統知識或某一生物的品種變成商品，忽視了生物品種其實是來自大自然的賜予。這是在「市場基要主義」之下，事事要求商品化的又一個例子。<sup>53</sup>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前提下，物種與傳統知識可以商品化，就連生命也可以商品化。遺傳基因改造（genetic modification）已不只是科技的探討，更是商業開發的實務了。美國遺傳基因工程公司莫桑多（Monsanto），率先倡導對世界各地的重要農產品進行遺傳基因改造。這麼一來，北美洲各地種植的玉米，大部份都遭受了基因改造（例如加入蜘蛛的基因），不再是大自然賜予的天然玉米品種。對於投資者來說，基因改造玉米能夠免用某些農藥、或抵受某些農藥，減低防止蟲蛀玉米的成本，農業公司利潤更大。對於消費者來說，是否接受消費這種基因改造玉米，乃是個人選擇的問題。但在北美洲各地超級市場零售的玉米和玉米產品（例如早餐「麥片」、粟米粉等），很大比例已經是基因改造的；再者，產品缺乏標籤，消費者從何選擇？而且大部份產品都經過改造，又何來選擇？對於農民來說，更有十分深遠的影響。由於經過基因改造的玉米，知識產權屬於遺傳基因工程公司；因此，農民收割他種植的改造玉米之時，無權保留這些基

53 參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 *Global Capitalism*, Vandana Shiva 的論文。

因改造玉米的種籽，否則莫桑多公司可以控告農人侵犯其知識產權、以及偷竊其基因改造玉米的種籽。千百年來，農民收穫留種的做法，也由於商品化的介入而打斷了。即使你堅持栽種天然玉米，但隨風飄來鄰人種植改造玉米的花粉，你的天然玉米田無可避免產生了一些改造種籽，也會入罪。加拿大就有這樣的案例，農人惹上了官司。<sup>54</sup> 這其中不單是古來就有的以強凌弱的問題，更有「市場基要主義」之下、生物品種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biological species）的新興問題。<sup>55</sup> 這問題也不限於北美洲的玉米種植。幾年前，莫桑多遺傳基因工程公司也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簽訂了合約，進行稻米的基因改造。基因改造食糧離開香港居民的基本口糧實在並不遙遠。

食物的遺傳基因改造帶來的後果如何仍然是未知之數。一方面，不少人擔憂基因改造食物對人體健康有沒有不良影響。醫藥衛生界對此異說紛紜，不過多國政府已經立法規定改造品種必須在食品標籤上說明。另一個深遠的問題是，在經過基因改造以後，物種應付環境轉變的能力會怎樣呢？大自然物種繁多，同是稻米，已有千百種，各自能夠適應不同環境狀況；環境變異，一種稻米死光了，自然界（和農人手上）仍有別的稻米品種，或可適應新氣候、新環境。地中海橙不適應加州環境，但新會橙卻在加州生長蓬勃，就是歷史上的一個顯例。人工品種改造只專注目前的商業收益，更改資本家要求的某些基因，以求降低成本、提高利潤。改造的品種經由公司傳播，排擠了各種天然品種、一品獨大，它卻未必能應付或適應轉變的環境。環保學者和農業經濟學者不禁要問：會不會有一年廣大地區同一種農作物同時失收，引致嚴重糧荒，而這作物再無活種可用呢？<sup>56</sup>

## 2.4 全球一體化的論爭與抗爭

上文指出，交通運輸和通訊的發達，打破了大地海洋的阻隔，促

54 Jennifer Kahn, "The Green Machine: Is Monsanto Sowing the Seeds of Change, or Destruction?", *Harper's Magazine* (April, 1999), 70-73.

55 參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 *Global Capitalism*, Vandana Shiva 的論文。

56 參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 *Global Capitalism*, Vandana Shiva 的論文。

進了五大洲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理念的人之間的溝通和瞭解，容許人們衝破畛域、國籍和膚色的圍限。有了現代的交通和通訊科技，理應增進全人類一家親，消滅無謂的分歧，實現「地球村」（global village）相親相愛、相諒解、相扶持的「大道之行」。但是運輸和通訊的進步，在同一個社會裏和在國際間，卻也同樣可以助長優勢社羣擴展他們的既得利益，擴大他們與弱勢社羣之間的差距；也由於衝突和剝削的機會都增加了，因而擴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鴻溝，實行所謂「環球搶掠」（global pillage）的霸業。關鍵在於利用新科技的人憑着什麼理念、建立怎樣的制度、推動怎樣的全球一體化。主導思想究竟是私利和物慾、弱肉強食的惡性競爭，還是社會上、世界上人人的健康、快樂和心智、文化與心靈的成長呢？

全球一體化的影響龐雜而深遠。二十世紀後期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對世界上很多人的生計和信守的價值觀念，打擊都甚大。因此，過去幾年，每當世界貿易組織舉行周年大會的時候，世界各地都有不少示威者齊集會場之外抗議，高喊「反世貿」的口號；2005年年底，當世貿會議在香港舉行，也有同樣的示威。最早亦最矚目的、針對世界貿易組織的示威活動是在1999年美國西雅圖世貿會議舉行期間；連日的抗議，愈趨激烈，終於迫使會議流產。這類「反世貿」的示威所針對的，並非反對跨國貿易本身，也不是反對全球一體化——並非反對不同種族國籍的人之間的融合；而是反對以特定模式、「從上壓向下」的、「市場基要主義」為基調的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具體地往往是針對某些西方國家的不公平措施。例如，假使美國向世貿控告某非洲國家違反貿易公平協議，其勝數的機會是遠大於非洲國家肯亞向世貿控告美國的，最少因為雙方訴訟的資源極不平等。所謂公平貿易的協議、執行與運作，實在是偏幫了西方較富裕的國家。<sup>57</sup>

舉一個大家都會有所記憶的例子。2005年韓國農民遠道來到香港參與「反世貿」示威，針對的重要議題正是當時世貿會議討論放寬農

57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hapter 6; Joseph Stiglitz,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6), Chapters 1,3 and 10.

心靈何價？

業產品入口的議題。當中的爭拗點，在於放寬農業產品入口的同時，歐洲各國及美國卻不答應取消他們對國內農民的津貼。既然本國政府一向津貼本國的農產品，即使放寬外來農業產品入口的限制，其他國家進口的農產品仍然難以跟本國競爭，而本國農產外銷，則有價廉物美之利。相反，韓國政府一向都只對國內農民提供非常有限的津貼，一旦開放該國的農業產品市場，則不允再向別國農業產品收取較高的關稅，歐洲及美國等受到政府大量補貼的農產品，定會以低廉的價格湧進韓國，與本地的農業產品競爭。然而，當南韓等亞非國家要求歐美各國先取消對國內農民津貼，然後再開放世界農業市場，歐美各國卻辯稱津貼制度由來已久，不能取消。最為不公平之處，在於歐美各國對國內農民的津貼不被禁止；但倘若韓國政府在開放農業產品市場的同時，也為國內農民較大的提供津貼，則會被指違反了公平貿易原則。於是，在「市場基要主義」的旗幟下，由於國與國之間的勢力不均，是非黑白都只是根據某些國家的利益來判斷。韓農欠缺補貼的產品運到外國，也不會爭取得到海外市場；在這樣不公平的比拼之下，沒有「相對優勢」的韓國農民只會面臨失業和農村破產的命運。「資本主義全球化」也許有助於若干韓國重工業商品的出口，從而增進韓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和某些韓人的財富，但卻幫助不到廣大韓人維護和發展他們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sup>58</sup>這就是韓農在香港街道上「三步一拜」，朝聖式地進行抗議的背景因素。

全球一體化的好處、壞處及各個層面的正負影響，皆引起激烈的論爭。這些爭論主要可分為兩方立場：究竟全球一體化是「從上而下」——即由國際金融機關（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貿易組織（WTO）等，以至美國的財政部及商務部等）所帶動？抑或是「從下而上」——由民間或大眾所發展出來的？<sup>59</sup>「從上而下」的全球一體化大家耳熟能詳了。相反，「從下而上」全球化的例子卻可能忽視了。舉例來說，1971年成立的「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58 Stiglitz,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Chapter 3.

59 Stiglitz,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Chapter 10; Jeremy Brecher, et al.,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0).

Frontières, MSF) 組織即為一「從下而上」的全球一體化產物。一羣醫生護士，利用他們學有所成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不是為了賺錢，也不單單為自己國家的人民服務，而願意犧牲個人的時間精力、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險，到槍林彈雨、疫病流行、死亡枕藉、慘遭天災人禍摧殘的地方為當地的人服務，這樣的醫療服務跨越了國界，遠達地球上任何地域，正正是實在的全球一體化，體現了人類無分畛域、不問國籍、膚色、語言、宗教，一體互愛互助、同舟共濟的世界公民意識。「無國界醫生」贏得世人的尊敬及捐助，和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等的嘉許。跨越國界的愛心服務，雖然也有先例可援——1949年前來華的西教士醫療服務，就有很顯赫的歷史——但「無國界醫生」的特別和創新之處，在於它沒有「母國」、沒有任何政府、教會、大公司或國際組織的庇蔭，是一羣不同國籍的平民年青醫護和衛生人員的自發組織，在世界各地六十多國服務。這樣的全球一體化，是「從下而上」的。接踵而來的，還有「無國界工程師」（Engineers Without Borders, 2000年成立）、「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1985年成立）等，都是沒有武裝、沒有銀彈，只憑着學識、勇氣和熱誠，體現全人類一體的意識。還有，各國民間組織為了回應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而舉辦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年會（第一屆於2001年在巴西舉行），一起討論「全球化」在各地的利弊與趨向；與及近年各地環保團體每年三月舉行的省電教育運動「地球一小時（Earth Hour）」，也都是「從下而上」的全球化事例。<sup>60</sup>

事實上，除了以上所舉「無國界醫生」的例子，很多跨國界的教會之間、大學之間的交流都體現了全球一體化，只不過這些跨國交流都與「市場基要主義」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理念背道而馳，因而不受商界或重商的傳媒所重視，社會大眾也鮮有機會聽聞。

（反之，傳媒倒會報導把教育商品化、包裝「外銷」的項目，吸

60 參Wikipedia, “World Social Forum”; “Porto Alegre Declaration”; 及“Earth Hour”等；Naomi Klein, *No Space, No Choice, No Jobs, No Logo: 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 (Toronto: Viking Canada, 2000).

心靈何價？

引外地學生付款來到本地求學，稱之為「教育國際化」。傳媒往往也盲從了鼓吹「自由貿易」的商人或經濟學家的立場，假定「反世貿」的人都是「保護主義」者；其實世界各地「反世貿」的羣眾運動當中，只有一部份採取「保護主義」的立場，但大部份卻只是要求實施公平、合理的貿易規則。）<sup>61</sup>

### 3. 經濟政治轉變對社羣和品格的衝擊

以上的各種全球經濟轉變，與及經濟學家影響政治領導人、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為整個社會帶來了什麼衝擊？倫敦大學的社會學家安東尼·傑登思（Anthony Giddens, 1938- ）向讀者描繪出一個《脫了韁的世界》<sup>62</sup>。此書是輯錄傑登思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委約，就全球一體化現象作出的一系列演講的錄音。這系列演講的製作和廣播，也是全球一體化的體現，因為其中一場演講走出了倫敦，來到香港，在英國廣播公司分站錄音室內進行，從香港向全世界廣播的。傑登思在此書中指出，全球一體化的現象是史無前例、從不曾有人經歷過的。一方面，以前的電腦科技並未發展至可以接通全世界；另一方面，過去也不曾出現過完全沒有外匯管制及關稅管制的經濟交流環境。正因為這些現象前所未見，因此也沒有人可以完全了解及掌握到全球一體化的發展，我們只知道這個現象正使到全球經濟有越來越緊密的聯繫。聯繫會受到多方面及多種因素影響，而其運作是不會跟從故有規律與秩序的。

一個明顯而簡單的例子就是在傑登思的書出版之後數年，現正發生在我們眼前的2007至2008年美國的「次按危機」。它肯定會嚴重衝擊我們的生活，然而大家對影響的程度、如何影響等等，都毫無頭緒，因為當中的運作、以及所牽涉的因素實在太複雜了。我們知道的是美國有很多放款機構多年來不負責任地放債，做了很多「次等按揭」業務。但這些債項有着很多與市場聯繫的因素不為大眾察覺，因

61 Stiglitz,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Chapter 1。

62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為債項與基金、衍生工具等架床疊屋，甚至是銀行家也無法充份意識到的。在全球一體化的經濟發展之下，美國這個危機也蔓延到歐亞社會每一個角落。這樣的問題，是現有的社會制度根本無法適應和應付的。換句話說，我們的經濟現時正面對巨大的風險，但是這些風險跟過去千百年來人們面對的風險，性質非常不同。在近代世界，人們面對變動的一種常用方式是保險：憑過往的經驗，估算各種不如意事情發生的機率（風險），從而作出適切的財務準備，讓人們得以有點財力（保金）應付這些不愉快的景況。傳統社會、或甚至是二十世紀初的社會中，人們面對的風險往往是來自外圍的因素，例如風災、火災、戰亂等等；人們購買保險，也是因應着這幾方面去投保，但卻不會就「美國次按揭延崩潰」、或是「地球暖化」等風險去購買保險。我們現在面對的風險，大多是在近幾十年間由人為因素所造成。我們對這些風險的形成知之甚微，因此對之也無法準確掌握，也無從確實估計甚麼機率。就以「全球暖化」問題來說，我們粗略知道造成全球暖化的原因，估計得出倘若過去二三十年的環境污染等趨勢持續下去，再過二三十年全球海洋水位會上漲若干、瀕海地區——香港、澳門、廣州、上海、高雄、紐約、倫敦等都市，都會淹沒，等等。但我們卻無法掌握現時暖化的實際程度和狀況，也無法預測全球暖化引致明年氣候轉變的具體情況。在2007年我們也不能預測到在「拉尼娜」現象影響下，2008年初本港天氣會長期維持寒冷，因此養殖漁戶也無法預知而購買「寒流凍死魚」的保險。由於以上這些風險實在難以預料和掌握，因此風險評估也越來越艱難，但卻不得不面對。面對全球一體化的許多新事物、新問題、新挑戰，人們就需要對確實和或然、安穩和風險，培養新的態度、新的想法。

經濟全球一體化對世界各地的文化傳統已帶來很大的衝擊。千百年來故有的做事方式，在全球一體化之下，人們發現並非必然、並非不可變易的，而在面對很多挑戰之下，仍是需要改變的。今日世界資訊科技發達，大家只要按開電視或透過「互聯網」（Internet），很容易接觸到有關其他社會、其他地方的資訊；接收這些資訊的同時，我



心靈何價？

們也會不期然地把異地的做法跟本地的故有做法進行比較，思考彼此的利弊優拙，甚至質疑自己那一套故有做法是否正確。這樣，大家難免對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羣體認同，會有不同的詮釋和反應。有些人會認為自己的身份就是要維護傳統、守住舊有的一套，即所謂的「基要主義者」（fundamentalist）。另一些人則展望未來、認為全世界將來都會變成同一個模樣；持這種想法的人，心目中的未來可能是美國流行的某種模式，或可稱為「麥當勞主義」（McDonaldization）。

總括言之，傳統文化遭受質疑的最重要層面，往往是倫常關係。在世界各地的傳統社會裡，最核心也最典型的倫常關係是父權主義（patriarchy）的倫常關係：就是說，父親是一家之主、擁有無上權威；男人比女人、長輩比後輩、年長者比年輕者，也都是地位較高、權力較大。父權主義的觀念，每當與世界其他地方作比較時，往往受到衝擊；人們轉而尋求一種相對較為民主及平等的倫常關係。

這些關係的轉變，同時也往往跟社會上的民主政治發展互相印證。事實上，在全球一體化情況加劇的近二、三十年來，我們目睹世界各地民主政制的發展也越來越普及。這往往是受到資訊科技發展的影響。例如我們在2007至2008年間從電視螢光幕上看見在巴基斯坦，千千萬萬人民不滿軍人獨裁政治，即使面對着自殺式炸彈爆炸及槍林彈雨的恐脅，仍冒着生命危險行使選民的權力到票站投票，希望以選票的力量把軍人總統請下台。這樣的場面，發生在一個又一個地區；大家意識到，世界各地有很多人都在正朝着民主的方向發展。這是人們對全球一體化的一種回應。

資訊科技促進民主政制發展的現象，早在二、三十年前已經開始。1980年代率先發生的是韓國光州學生示威，被軍警暴力鎮壓的事件（1980年5月）；接着是波蘭團結工會<sup>63</sup>起來向波蘭共產黨政府爭取工人當家的權利（1980年9月-1982年）；繼而有菲律賓人民力量反對

63 波蘭團結工會全名為「獨立自治工會『團結工聯』」（Niezależny Samorządny Związek Zawodowy Solidarność）；英文簡稱“Solidarity”；中文常譯作「團結工會」。

「終生總統」費迪南·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 1917- 1989, 1965-86任總統）的「人民力量」和平大示威（1986年2月）；然後是眾所周知的1989年4月至6月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緊接「六四鎮壓」以後不到半年，捷克、波蘭、羅馬尼亞、東德的民主運動紛起，柏林圍牆被推倒、等等。以上各個事例中的參與者，多半是透過電視目睹及參考了其他地方的民主運動的發展。1990年代以來，「互聯網」的普及，使各地平民之間的資訊互通，更為便捷。因此，全球資訊的交流也助長了全球平民力量的互相激勵。這互相激勵建基於一個意念：就是人的命運並非生而固定的，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是可以改變的。如果經濟可以轉變，許多其他現實，包括政府、政制、民生、社會制度和風俗等，也都可以改變。全球一體化使大家知道，「命運」既非先天命定，人們並不一定需要遵從壓在頭頂上的權威；人是有權改變自己命運的：這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民主政治是一套機制、一套處理大眾事務的運作方式；這些機制和方法，因時因地而異。但其背後所持的理念，正是每個人皆有權掌握自己的命運；個人力量單薄，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就得與其他處境相類的人團結互助。

傑登思指出，在全球一體化的衝擊下，我們需要看到三方面平衡地發展：市場、政府及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他認為，市場雖然能夠幫助經濟發展，但他不接受「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基要」思維；他指出完全自由的市場並不利經濟的健全發展，因此需要政府對市場予以一定程度的制約；然而，政府的制約也需要建基於民主的政治及受到公民社會的支撐與監察，否則權力和利益就會過於集中，既不公平、也妨礙社會和經濟的健全發展。因此，只有市場、政府及公民社會三者之間互相制衡，才可能維持平衡的發展。市場、政府及公民社會三者的互相制衡，需要資訊自由的流通；但如果國內的資訊被三、兩企業所壟斷，就會產生問題。（一個反面的例子是意大利近年的政壇：總理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 1936- ;1994至2009年間四度任總理）是個富商；他從政前收購了主要的電視台和

心靈何價？

其他傳媒機構，讓他足以左右輿論方向，乃得獲選為總理。）因此，如果國內的資訊，以至跨國的資訊被壟斷（例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只由個別的資本家或集團控制的話，就不足以成為市場、政府及公民社會三者互相制衡的基礎；而要做到國內外、跨國資訊的流通，無論在國內或國際間都需要實行民主。

傑登思對社會和政治趨勢的宏觀分析，當然不是全球一體化的最後結論，但總有助我們思攷諸多有關的問題。<sup>64</sup>從宏觀層面回到個人身旁，另一位社會學家的研究也許更能觸及我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得來的感受。在倫敦大學任教的美國社會學家李察·塞納特（Richard Sennett, 1943-）近年的兩本著作，《品格的腐蝕》和《新資本主義的文化》<sup>65</sup>，針對「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及「市場基要主義」為社會和個人帶來的影響作了深入的討論。塞納特這兩本書的研究，乃是訪問了在工廠和辦公室工作的藍領和白領人士，由他們親口分享個人的生活體驗與感受，從而揭示出當代社會的問題；有些個案他更訪問了兩代人，令不同時期之間的落差對比更為鮮明。

塞納特根據他這些長時間的「在地研究」（grounded research）收集的資料，指出資本主義西方社會昔日——從十九世紀後期至到二十世紀中後期——那一套工業制度，是科層制度（bureaucracy），而當代（「市場基要」思維帶動的）「新資本主義」之下冒起的則是「彈性管理制度」（flexible management）。科層制度猶如一個金字塔形的鐵籠：工廠有一個廠長，其下會有幾名中層經理、一羣管工（即組長，foreman）、最下層是大羣生產線上的工人。科層制的運作，指令一層一層下達，前線狀況則一層一層向上彙報。這個金字塔模樣的鐵籠雖然對其內的人設有很多規限，但同時也是人的一個依傍。它是個穩定的結構，需要一羣人長期相處、共事、有規程、有默契。工人進入這工廠工作，雖然是被規限在鐵籠內，但只要他的工作表現不過不

64 參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 *Global Capitalism* 中的對談及各章。

65 Richard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New York: Norton, 1998); Richard Sennett,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失，無風無浪，他可以預計自己在鐵籠內工作一輩子；他和他身旁的同工可以維持一段長達三數十年的工作伙伴關係，大家互相認識、每天互相噓寒問暖，彼此了解對方的家庭環境與子女情況。工作性質雖然沉悶，不要求什麼創意或主動，但仍然要盡責去做，而在心理上、感情上大家可以在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工作。更重要的是，人們可以體現到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說的「基督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所謂「基督新教倫理」就是：人們相信今天勤奮工作付出血汗與辛勞，明天是會有好報的——也可說是「延遲的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人們教育孩子，也會對他們說：「你們現在努力讀書，將來會更好；但如果現在不用心唸書，將來就會做乞兒了！」。即是說，你現在需要辛勞、需要捱苦，是為了「明天會更好」。人的品格，就是由這套「基督新教倫理」和長久的、互相關顧的社羣關係與工作自尊培植出來的。

科層制度能夠運作，正正在於它既有限制又有依傍。假如你在工廠內負責掃地的工作，工作的性質固然非常沉悶乏味，個人自由也受到很多限制，但你可以擁有一份自己的「生涯想像」：想像自己在二十年、三十年後仍然擁有這份工作，跟這一班人共事，並且可以預計每個月得到多少工資，也有信心每年會有一點一點的加薪，可以預計在若干年後能夠用按揭方式買房子，再過二、三十年供款完畢，擁有自己名下的物業居所，有穩定的鄰里；你還會看着自己的子女一年一年長大，可以放心每個月都定時收到工資，解決一家大小的生活、供書教學，讓子女有出人頭地的機會。這份「生涯想像」為每天做的事情賦予心理上的意義。<sup>66</sup>

然而，當這工人的兒子長大成人，大學畢業了、甚至取得工商管理碩士（MBA）學位，繼而擔任財經顧問。兒子的入息比父親高出許多倍，做的工作也日新月異、甚富挑戰性。但是，他卻需要面對每一天轉變的工作環境，使他在職場完全沒有朋友、完全孤立地謀生。塞納特在1970年代訪問這樣一位工廠工人；到1990年代再遇上這工人的

66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Chapter 2.

心靈何價？

兒子。他訪問這位擔任財經顧問的第二代時，年青人向他表示，在他印象中父親是一個乏味的人，他從前很抗拒聽父親說教，卻在耳濡目染之下吸收了「基督新教倫理」，努力讀書，終於享有今日的專業地位，享有驕人的薪酬。可是，在現時的工作條件下，他的家庭生活變得完全沒有意義。工作時間雖說是彈性，但時間通常都很長，跟妻子兒女相聚機會則很少。又每隔三兩年需要改變工作地點，家庭的居所也要隨着新的工作地點而遷徙，一家幾口接二連三地搬遷到完全陌生的環境、從新開始生活，遠離了既有的朋友及左鄰右里。經歷了一兩次遷徙以後，由於可以預期再過幾年又會因為工作地點改變而再度搬家，他與家人都不會再用心去深入結交新的同事和鄰居。這樣，他們一家幾口在上班、上學、回家的生活中，只有泛泛之交、沒有知己朋友，年復一年，過着半孤獨的日子。

最令這位第二代苦惱的，是對子女的教導。他說，雖然他父親教給他的「做人道理」，他一向感覺是刻板乏味的陳腔老調，但他現在連最基本向子女「教什麼」也想不出來——我還應教導他們那一套「基督新教倫理」的價值嗎？如果教子女這一套「基督新教倫理」，一旦子女將來任職的企業機構採取「彈性管理」，將科層制度的整個金字塔拆毀，工作的前景即時變得毫無保障，只要雇主認為你今年對機構沒有貢獻、沒有利用價值，就可以隨時把你解僱掉；「延遲滿足」會兌現嗎？<sup>67</sup>「新資本主義」最獎勵的不再是實物生產的定期利潤，而是股價上落的短線「業績」。在這制度下，「彈性管理」是至高無上的智慧。過去百數十年奉行的一套工作倫理，在「新資本主義」者眼中，已變得僵化、脫離實際、不能作所謂「框外思維」（“think outside the box”）、缺乏競爭力。無論你如何努力、盡責，在今今的工作模式下，不要說二、三十年後，即使是兩、三年後將會面對怎樣的情況，工人、甚至管理層都無法預見；人人都是面對着浮動的職業歷程。在這樣的大氣候裏，人們失去了自己的「生涯想像」、終生的關連和工作的意義，失去了鄰里和職場的友儕，如何

67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Chapter 1-4.

栽培品格呢？這就是《品格的腐蝕》一書的主題。品格受到腐蝕了，個人孤立了、羣體式微了。塞納特最終提出一個問題：這一批孤立的個人，能否再凝聚成為一個社羣呢？他這本書的結論是：希望還是存在的。他記錄了一次訪談的經驗：一羣遭受「新資本主義」和「彈性管理」裁撤而失業的人聚集在廉價咖啡室閒聊，各自說出個人的失意與不幸。在多次談話與訴苦的過程中，這些失落的電腦專才漸漸從只顧表達個人——「我（I）怎樣、怎樣」，說着說着慢慢演變成「我們（we）什麼、什麼」。塞納特指出，對於「新資本主義」來說，「我們」（we）這個字眼是一個「危險的代名詞」（“a dangerous pronoun”）。因為「新資本主義」人人為己、競逐名利、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不接受合羣的「我們」意識，而只接受孤芳自賞的「我」的取向。「我」是個別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彈性管理」取消了科層結構、取消了鐵籠；資本家大老闆利用電腦科技直接向個別生產者發出指令，直接監控工作進展。產品的推銷，也是直接針對個別的消費者。資本家用得著人們「跟風」的「羊羣心理」（herd mentality），但卻不樂見人們的合羣精神。<sup>68</sup>

#### 4. 「資本主義全球化」對中華傳統價值和基督宗教價值的挑戰

資本主義全球化對中華傳統價值和基督宗教價值有何挑戰，是這講座的主題。

孔子說：「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第二），意思是，正人君子不是一件只有功利價值的器皿、工具，而是本着自己的抱負和原則，堅持做自己應做的事的一個人。塞納特的研究分析卻指出，在「新資本主義」社會裏，最吃香而同時品格最為腐蝕的行業是「商業顧問」（business consultant）。「商業顧問」的工作模式是以一個接着一個「項目」（project work）為本的，今天在這間公司接辦某一個調查評估或報告，一兩個月後又會到另一間公司承包另一個項目。一方面，對人對事都沒有長期承擔和責任；另一方面，接受委約往往不

68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Chapter 8.

心靈何價？

是運用自己的什麼聰明才智、專門知識，為人提供一些自己心底裏相信的解難辦法，卻是需要揣摩老闆的意思，在自己署名的報告裏寫出老闆不方便親自說出口的話。（跟醫生、工程師、會計師、律師、以至研究助理、等，同樣是從事「項目」工作的，很不一樣。）這種「受人錢財、替人操刀」的工作，難以養成真正的職業自豪和個人自尊。近二十年來，「商業顧問」受聘於某些公司推動甚麼合併、收購、彈性管理、精簡架構等，大幅裁員，把有關商行或公營機構弄得翻天覆地、人面全非以後，「顧問」大功告成，收取委約酬金，離去無踪，完全毋需負上任何責任。即使商場的實際經驗顯示，合併和收購（mergers and acquisitions）多半對生產和利潤沒有裨益，更遑論對社會有建樹。「彈性管理」往往也不能改進商業機構的效率；但是「商業顧問」的行業仍然大行其道，吸引了不少成績優異的大學生入行——最少在「金融海嘯」發生以前如此——而上一代這樣的學生多半是會選擇主修醫藥、法律、工程、教育、新聞、社會服務或學術研究的。「新資本主義」的「理性利己」、「貪婪是好」的價值觀念，對當今社會的影響在此可見一斑。「商業顧問」這個行業是否對應着孔子所說的「君子不器」呢？

孔子說自己的生活：「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第七）。他教導他的學生，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第四）又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論語》學而第一）《論語》裏像這樣勸勉人要選擇儉樸生活，不要沈迷物慾的章句，不勝枚舉。

從個人到治國的政策，《大學》說：「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大學》第十章）孟子也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孟子》梁惠王上）又說：「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在現今的「新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無時無刻不是「利」字當頭，「貪婪是好」，以賺取最高利益為一切事情的目標，推行的政策、管理的手段，往往都不可說是「不忍人」的。正正是與孟子的說話相違背。老子也說：「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道德經》第8章易性）。「新資本主義」的市場至上思維最強調的、最高的價值，卻正是競爭的價值。佛家說的「四聖諦」及「八正道」，以「貪」、「嗔」、「癡」為人生苦惱的根源，也與「新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截然相反。

福音書中，耶穌說：「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路16:13）「瑪門」是財神，就是說人不能既拜倒於金錢之下，而又同時事奉上帝。耶穌又說：「有錢財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路18:23-24）。耶穌又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25:35-40）

以上每段引文，都顯示出中華傳統文化和基督宗教的好些根本價值，如何跟「新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而私利、競爭、物慾的信仰，卻乘着「資本主義全球化」大行其道，在社會上、輿論界、政治圈取得主導地位。這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對中華傳統文化和基督宗教的不容躲避的挑戰。

\* \* \* \* \*

綜合這第一講的內容，在二十至廿一世紀之交，「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發展到了兩個大限。一方面，本來已屬對大自然不負責任的西方工業文明，隨着「離岸生產」等營商手段，擴散到世界各地，使環境污染、虛耗能源等問題嚴重惡化，導致生態失衡和地球暖化急劇

心靈何價？

加速，天災頻仍。同時，「自由貿易」雖然刺激了局部地區的經濟增長，讓一部份人很快地富了起來，但是貧富懸殊，跨境剝削等問題，在「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等機關的現有方針之下，卻日甚一日。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全球化」在富裕國家的欠缺規管的金融業務，經過二三十年的急速膨脹，至今則災難性地失控，引發了「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億萬人蒙受損害。

這許多「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背後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市場基要」思想，在市井間常以「貪婪是好」一語道破。其中有許多理念、用語、手法、習尚，已成了社會上的主流。這是我們需要憑藉我們的基督宗教和中華文化兩大傳統，好好地反思的。正如盧龍光在他的《愛你的鄰舍：教會社區工作理論與實踐》一書裏明確指出：

「歷史中的經驗，不斷證明了罪惡權勢可以透過社會集體所建立之制度及政策去扭曲人的善性及道德，使人不但成為罪惡的工具去傷害人；而同時亦成為罪惡的受害者…故此，我們不能對罪惡的權勢掉以輕心，必須醒覺及認識自己會成為罪惡的工具，也要對抗傷害我們的罪惡勢力。罪惡的權勢不但在我們個人的內心裏發動，…亦會透過社會制度與政策，使我們成為既得利益者，並剝奪別人的利益而缺乏自省的能力…」<sup>69</sup>

我們在此無需遽下斷語說「新自由主義」及其政策、制度，不是什麼「罪惡」。但「貪婪是好」的價值觀念腐蝕人心，扭曲人的善性，跟我們的兩大傳承背道而馳，相信是大家的共識；而萬人貪利引發的「金融海嘯」正傷害着很多人，更是有目共睹的。本着儒、釋、道傳統與基督宗教的價值觀念，對當前的主流信念、政策和制度，好好反思，實在是刻不容緩的。

林榮洪在第一屆「龐萬倫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講座」說過：「傳

福音與關懷公義，伸張公平是不可分割的雙重責任。耶穌基督的大使命是叫我們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祂的大誡命是囑咐我們愛鄰如己。這兩者之間，並無輕重之分或先後之別。」<sup>70</sup> 沈青松在第三屆講座也指出：「儒家的成德之教，如果失去了實踐的向度，往往會淪為只有思想上或口頭上的價值，甚或成為要求他人的高標準，而失去個人的道德理想應有於自我指涉與篤實踐履的特質。」<sup>71</sup> 我們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對我們做人處事的挑戰，如何本着我們的兩大傳承，作出適切的回應呢？這是第三講將要探討的問題。以下第二講先把問題較為具體化地帶到教育的領域。

69 盧龍光：《愛你的鄰舍：教會社區工作理論與實踐》（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3），頁52-53。

70 林榮洪、溫偉耀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2001），頁40。

71 沈青松著：《對他者的慷慨：從外推精神看中華文化與基督宗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2004），頁xvii。